

红旗

H O N G Q I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复信

巴黎公社的伟大启示

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

焦裕禄同志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好榜样

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一九六六年

4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六年第四期 目录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复信 (1)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二月二十四日

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来信 (3)

巴黎公社的伟大启示

——纪念巴黎公社九十五周年 郑之思 (4)

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

..... 戚本禹 林 杰 阎长贵 (19)

焦裕禄同志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

好榜样 本刊评论员 (31)

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解放军某部侦察连的哲学故事会 张延吉等整理 (35)

实践出智慧 宋乐山 (41)

日常工作中的辩证法 (四篇) ... 王培建 黄玉明 姜大洪 刘 杰 (52)

简单一些好, 还是复杂一些好? 徐承德 顾 舒 (57)

坚决突出政治 反对折中主义 (读者来信) 倪志荣 (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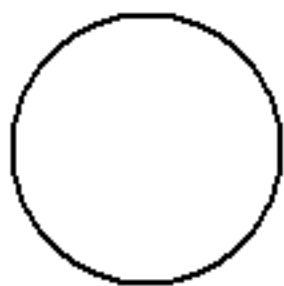
☆ 三月二十四日出版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复信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收到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四日的来信，邀请我们派代表团作为客人参加你们的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

一个党开代表大会，邀请别的兄弟党派代表团参加，在通常的情况下，应当说是一种友好的表示。但是，就在你们发出这次邀请的前后，你们在苏联向党内外散发反华文件，并且从上到下，直到基层单位，组织一系列的反华报告，煽动反华的歇斯底里。你们还向其他国家的党发出反华信件，策动他们同你们一起反华。你们放肆地污蔑中国共产党，说我们“好战”，“假革命”，“不反帝”，“鼓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冒险主义”，“分裂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教条主义”，等等。你们还制造谣言，说什么中国“阻挠援助越南”，“中国侵略苏联领土”，甚至说“中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你们这一系列的反华活动只能说明，你们的这一次邀请是故意作态的，是别有企图的。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设想，被你们看作是敌人一样的中国共产党去参加你们的大会呢？

中国共产党过去曾经多次参加过苏联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苏共领导以后，我们也派过代表团参加你们的第二十次、第二十一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但是，你们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突然大反斯大林。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你们反斯大林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反苏、反共、反华、反人民、反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你们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公开地大反阿尔巴尼亚，并且指责中国共产党，使我们的代表团团长不得不中途回国。



俄国是列宁主义的故乡，曾经是国际工人运动的中心。在斯大林逝世以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逐步地暴露了自己背叛列宁、背叛列宁主义的真面目，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伯恩斯坦、考茨基背叛马克思和恩格斯、背叛马克思主义的老路，使苏共领导变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中心。

在过去十年中，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希望你们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后，我们又向苏共新领导提出过多次的劝告，希望你们改弦更张。我们对你们做到了仁至义尽，而你们却毫不悔改。

苏共新领导上台以后，沿着修正主义、分裂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你们一上台，就宣称你们坚决执行苏共二十大、二十二大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总路线。你们当面对我们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上，在对中国的问题上，你们同赫鲁晓夫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你们不仅没有宣布撤销一九六三年七月的反华公开信、一九六四年二月的反华报告和反华决议，而且采取更阴险的手法，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华。你们尽管玩弄了一些欺骗的手法，但是你们一心一意地追求的还是“美苏合作主宰世界”。你们所说的一些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话，你们所做的一些支持反帝斗争的姿态，只不过是美帝国主义的小骂大帮忙。这种手法，你们心里明白，美帝国主义心里也很明白。你们叫嚷的所谓“联合行动”，特别是在越南问题上的所谓“联合行动”，完全是一个骗人的圈套，其目的无非是要欺骗苏联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你们一直配合美国搞和谈阴谋，妄图出卖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把越南问题纳入苏美合作的轨道。你们同美国勾结在一起，在联合国内外进行一系列的肮脏的买卖。你们现在正在积极地配合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全球战略”，力图组织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包围圈。你们不但置身于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国际统一战线之外，而且联合全世界人民的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妄图建立一个反对中国、反对人民、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神圣同盟”。

你们不顾许多兄弟党的反对，在一九六五年三月召开了莫斯科分裂会议。这是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极其严重的步骤。我们曾经要求你们，公开承认召开莫斯科分裂会议是错误的，非法的。你们至今没有这样做。

我们愿意明确地通知你们：既然你们已经走到这样的地步，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郑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能派代表团去参加你们这一次的大会。

我们相信：全世界，包括苏联在内，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是要革命的，是要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包括苏联共产党在内，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共产党员和干部，终归是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轨道上前进的。全世界的革命人民，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伟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伟大的中苏两国人民，终将扫除一切障碍，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苏联人民可以相信，一旦苏联遭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实行坚决抗战，中国一定同苏联站在一起，共同对敌。

此致
兄弟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二月二十四日 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来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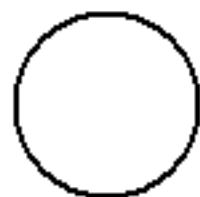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召开苏共第二十三次例行的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的日程如下：

- (1) 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报告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
- (2) 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报告人检查委员会主席诺·阿·穆拉维耶娃同志；
- (3) 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一九六六至一九七〇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的指示，报告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尼·柯西金同志；
- (4) 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邀请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作为客人参加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

致
共产主义敬礼！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列·勃列日涅夫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于莫斯科



巴黎公社的伟大启示

——纪念巴黎公社九十五周年

郑 之 思

编者按：伟大的巴黎公社起义九十五周年了。本刊这一期发表了《巴黎公社的伟大启示》这篇纪念文章。

巴黎公社最根本的原则，就是用革命暴力夺取政权，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坚持这个原则还是背叛这个原则，历来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根本分歧。

巴黎公社的原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了公社的经验教训揭示出来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原理。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等老修正主义者背叛了这个原则，堕落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奴仆。列宁同老修正主义者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保卫了公社的原则，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巴黎公社革命道路的继续和发展。斯大林高举列宁主义的旗帜，反对了各式各样的列宁主义的敌人，维护了巴黎公社的原则，保卫了十月革命的成果。

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共的领导，经过苏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一，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彻底背叛了公社的原则，彻底背叛了十月革命的道路，实行一整套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使苏联走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使苏共领导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国际中心。

这是从巴黎公社以来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反面经验。它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在还没有掌握政权的时候，如果抛弃了公社的原则，就谈不到领导革命，而且就会使自己变成叛徒和工贼；在掌握政权以后，如果抛弃了公社的原则，就会使人民革命的成果有丧失的危险，而且也会使自己变成彻底叛徒和工贼，变成帝国主义的奴仆和帮凶。

苏共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及其追随者为什么要那样疯狂反华呢？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伟大的中国革命，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取得的胜利，进一步继承了并且发展了巴黎公社的经验，进一步继承了并且发展了十月革命的经验。中国共产党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旗手，对于一切抛弃公社原则的叛徒都进行坚决斗争。因此



引起这些牛鬼蛇神们的仇恨和反对，这是毫不足怪的，是值得我們自豪的。

今天，重溫巴黎公社的經驗教訓，对于把反对赫魯曉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对于推进世界革命运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英勇的巴黎公社起义，已经九十五周年了。

九十五年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巴黎公社被凡尔赛匪徒淹没在血海里的事业，经过四十六个年头，就在列宁领导下的伟大十月革命中赢得了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巴黎公社原则、十月革命道路的胜利。

巴黎公社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革命，是无产阶级拿起枪杆子力图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力图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次演习。公社英雄们给我们留下了用鲜血换来的宝贵的经验教训。

目前，正当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口头上推崇巴黎公社，行动上背叛公社原则的时候，发扬公社的革命传统，吸取公社的经验和教训，更具有重大的意义。

无产阶级只有拿起枪杆子，才能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不愿作奴隶的无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紧握手中枪

法国在十九世纪，是站在欧洲革命运动最前列的一个国家。它一度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又一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从一七八九年到一八七一年，法国工人多次拿起武器，又多次放下武器或被解除武装。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经过八十多年

漫长的时间，付出了重大的血的代价。这样，无产阶级才逐渐意识到，当他们幻想在资产阶级领导下而不是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条件下去争取自身的解放时，他们手中的枪杆子，就只是起了替自己的敌人打天下的作用。革命一胜利，不管执政的是资产阶级右派，或者是资产阶级左派，他们都用解除工人武装来“报答”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一旦被解除武装，就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权利。

无产阶级自身解放的权利，应该由无产阶级自己拿起枪杆子到战场上去争取。法国工人终于一步一步地接近了这个革命真理。一八四八年的巴黎六月起义，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起义，就是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将这一革命真理变为革命行动的表现。在这两次起义中，无产阶级拿起枪杆子，已经是直接同自己的敌人作战，为自己的阶级打天下。

巴黎公社起义，是当时法国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斗争的高峰，也是当时国际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斗争的高峰。这次起义和法国工人历次起义比较起来，在运用革命武装去争取无产阶级自身解放权利的问题上，有许多伟大的创造：

第一，起义前半年，就着手建立工人武装，凭借枪杆子，不仅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政治组织（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和各区警备委员会），而且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军事组织（国民自卫军工人营和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

第二，坚决顶住了资产阶级政府的威胁





巴黎公社社员坚守累内大街街垒。

(新华社稿)

利诱，拒绝交出武器，国民自卫军第一次代表会议的第一项要求就是紧握手中枪。瓦尔兰说：“我们绝不能不经过战斗就缴械……只要我们一天不胜利，斗争也就一天不停止”^①。

第三，当资产阶级政府企图用暴力解除工人武装时，敢于用革命的暴力回答反革命的暴力，敢于在在有反动政府血腥镇压、外有强敌压境的条件下举行起义，变剥削阶级之间的掠夺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第四，起义胜利之日，没有放下武器，没有让出权力。马克思说：“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在于人民在首次起义之后没有解除自己的武装，没有把他们的权力拱手交给统治阶级的一群共和主义骗徒手里”^②。

第五，起义胜利后，依靠无产阶级的革

命武装，初步建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说：“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还在于他们组成了公社，从而把他们这次革命的真正领导权握在自己手中，同时找到了在革命胜利时把这一权力保持在人民自己手中的办法，即用他们自己的政府机器去代替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政府机器”^③。

第六，起义临近失败时，仍然英勇坚持战斗，宁肯拿着枪杆子光荣战死，不肯放下枪杆子忍辱偷生，表现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宁死不屈的大无畏精神。

毛泽东同志说过：“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很不

① 参看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44页。

②③ 《《法兰西内战》初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版，第602页。



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①巴黎公社的英雄们突破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毅然决然拿起枪杆子，去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这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一个巨大的进展，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新篇章。

剥削阶级一向认为，他们有权使用各种武器镇压被剥削者，而被剥削者手里有任何武器都是犯罪，至于拿起枪杆子造反，那更是滔天大罪。修正主义者为了适应这种反动观点，总是向无产阶级宣传“千万不要动用武器”的奴才哲学，并把一部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篡改成一部“和平过渡”的历史。对巴黎公社起义，也不例外。考茨基一讲起巴黎公社，就大肆渲染三月二十八日的选举，把公社说成是“全民投票”、“纯粹民主”的产物。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一讲起巴黎公社，就津津有味地“计算”三月十八日那天死了几个人，企图以此证明公社“是不流血地掌握了政权”。

稍微有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每一个革命运动，都有一个发展过程，要了解这个革命，就应该从总体上看，而不能从中抽出某一天或某一种现象，以偏概全，以个别代替一般。巴黎公社的全部发展过程，从起义前夕到流血的一周，充满了革命与反革命的生死搏斗，公社英雄们在武装起义和保卫起义胜利果实时所洒下的大量鲜血，决不是修正主义者的谎言所掩盖得了的。

**无产阶级应当采用革命手段，
夺取政权，粉碎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巴黎公社起义以前的法国政治舞台，很

像一盏走马灯，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各种形式，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迅速交替。这样，无产阶级就亲身体会到，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各种形式的交替，无非是统治者把统治权从这一手转到另一手，从这一集团转到另一集团。转来转去，照样是资产阶级统治和剥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也亲身体会到，在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各种形式交替的过程中，国家机器在每一次新变动中都变得更加庞大，更加完备，更加穷凶极恶地奴役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

法国无产阶级积八十多年（一七八九——一八七一）的经验，逐步意识到“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②，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就必须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是反对这个机器的这种或那种表现形式，而是粉碎这个机器本身。巴黎公社起义者就是这样行动的。马克思说：“这次革命不是一次反对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或帝制的国家政权形式的革命。它是反对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的怪胎的革命，是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它不是为了把国家政权从统治阶级这一集团转给另一集团而进行的革命，它是为了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恶机器本身而进行的革命。”^③

第二帝国崩溃后，一场政权争夺战就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逐渐展开。一八七

① 《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34页。

② 《〈法兰西内战〉二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42页。

③ 《〈法兰西内战〉初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86—587页。



○年九月初，资产阶级的各个派别为了保存现成的国家机器，防止政权转入人民手中，便迅速地达成协议，组织了美其名曰“国防政府”的新政府。无产阶级由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不足，还不可能立即成立自己的政府。但是，他们着手建立自己的政治、军事组织，这种组织日益成为巴黎工人区的实际政权，成为和“国防政府”对峙的一种力量。

当时，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和各区警备委员会，依靠工人武装和人民群众，监督国防政府和它的巴黎各区区政府的活动。工人区的警备委员会控制区长，或代行区长职权。当过市长的阿拉哥说，委员会“负责各区的武器装备、物资供应、社会福利等工作”，是“革命积极性的发源地”^①。达留伯爵说：“它们擅自对区长施加压力以影响其决定，包办代替区长的职权，发布命令，检查住宅，经常以防止间谍为借口，进行逮捕和搜查”^②。

当时，在国民自卫军工人营和革命群众的监视下，“警察局已经完全无能为力，警察局长乖乖地坐在那里，生怕被人抓走”^③。国防政府的头子特罗胥哀叹说：“市区街道已落在人民群众手里，法庭已失去作用，维持公共秩序、风尚和卫生保健的一切机关几乎都陷于停顿状态”^④。反动当局在短短几个月内，一连撤换数任警察局长，企图恢复警察统治，但都遭到失败。

很明显的，从第二帝国崩溃到巴黎公社起义，巴黎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政府，这和俄国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在彼得格勒出现的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相类似。

巴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对立面，建立与之相对抗的无产阶级的军事组

织，为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作了重要的准备。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当梯也尔挑起内战的时候，无产阶级正是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击败了梯也尔的反革命进攻，粉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巴黎公社起义者根据阶级本能和政治经验，认识到常备军和官吏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两个主要机关，他们在起义胜利后，立即破除这两个机关。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撤销常备军改由国民自卫军代替的法令》。法令规定：“除国民自卫军外，不得在巴黎成立或调入任何武装部队”，“所有适合服役的公民都编入国民自卫军”^⑤。公社解散了国民自卫军资产阶级营。

同时，公社又在《宣布凡尔赛政府命令、指示无效的法令》中规定：“公社现在是唯一的政权，……各种社会机关的职员今后必须确认凡尔赛政府或其拥护者所发出的命令或通知为无效，无法律效力。……任何官吏或职员凡不服从本法令者，立即解除其职务。”^⑥公社撤除了留在巴黎的反动官吏的职务，要求旧政府的一般职员老老实实地为人民办事。

公社打破了旧的司法机关，废除了反动法统，规定法官由人民选举，公社直接任命检察长。

公社在破除资产阶级统治人民的物质支柱——常备军之后，又立刻着手破除它统治人民的精神工具。宣布政教分离，取消宗教

①② 参看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第71页。

③④ 参看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第107页。

⑤⑥ 《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52、53页。



特权，等等。

巴黎公社起义者在革命实践中否定了蒲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错误主张。他们不是像蒲鲁东主义主张的那样，搞什么无政府状态，而是建立了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关。他们不是像布朗基主义主张的那样，搞什么少数革命家的专政，而是依靠无产阶级的革命积极性和主动性，初步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

为什么说巴黎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呢？

第一，公社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政权。它是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

武装起义中产生的，是在粉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基础上建立的。在它存在的短短的七十二天中，进行了反对国内和国际的资本主义势力的英勇斗争。《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说明一八七一年革命的社会实质的宣言》，把这种斗争称为“寄生生活和劳动、剥削和生产在相互搏斗”^①的伟大斗争。

第二，公社是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革命政权。它的主要支柱是工人武装，“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②。它

① 《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1卷，第145页。

② 《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68页。



巴黎公社成立以后，发布了一系列旨在摧毁旧国家机器和改善劳动人民生活和工作条件的法令。图是巴黎公社发布的一些法令。左边是《告农民书》，其中提出了一个符合广大劳动农民利益和要求的纲领。中上是关于成立国民自卫军的法令，中下是关于改善面包房工人工作条件的法令，右边是关于教会和国家分离的法令。
(新华社稿)



拥有工人和他们的群众组织的广泛支持。它的政策多数出自群众的倡议，反映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它的领导成员由群众选举产生，接受群众监督，群众可以依法撤换和罢免。

第三，公社是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议会式的革命政权。在公社中“代表机关仍然存在，然而作为一种特殊的机构，作为立法和行政的分工以及议员们享有特权的议会制，在这里是不存在的。”^①公社是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公社委员会颁布法律，委员会委员执行法律，并对委员会和人民负责。

第四，公社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革命政权。“因为公社不是为某种地方性的或狭隘的民族任务而斗争，而是为全体劳动人类、为全体被损害和被侮辱的人的解放而斗争。”^②《公社选举委员会总结》宣布：“巴黎公社的旗帜就是世界共和国的旗帜”^③。

第五，公社是一个以消灭剥削为目标的革命政权。“公社曾想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权。它曾想剥夺剥夺者。它曾想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工具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变成自由集体劳动的工具”^④。

巴黎公社的这些特征说明，它是一切剥削阶级政权的对立面，它不是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而是被剥削者掌握自己命运，争取自身解放的工具。因此，反动派把它看成是“洪水猛兽”。冒牌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也攻击公社“是由很少的选民选出来的，它的绝大多数成员是无名之辈，他们在能力上、甚至有时在人格上——至少对某些人来说——都是可以怀疑的”^⑤。他美

化凡尔赛的国民议会，攻击公社是发动内战的罪魁。他说：“啊！内战呀！可怕的斗争！大炮在怒吼！杀呀，死呀，那些在国民议会里宁愿牺牲生命也要和平解决这个流血问题的人，竟被迫不能作出任何行动，发出任何呐喊，也不能说任何话了！”^⑥这个叛徒的这些无耻谎言，活生生地勾画出一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丑恶嘴脸。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坚决驳斥了反动派对巴黎公社的污蔑。他们指出，公社由于没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因而是一个不完全、不成熟的无产阶级专政。但它在实现无产阶级的统治方面，作了具有世界意义的尝试。马克思说：“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指出，公社这种政权形式，以及公社的一些正确的措施，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产物，是人民群众创造性的结晶。拿起枪杆子力争自身解放权利，力争掌握自己命运的无产阶级，凭着自己的阶级本能冲破了蒲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束缚，在斗争中闯出一条路来。恩格斯说：“公社是旧的、法国式的

①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11页。

② 《纪念公社》。《列宁全集》第17卷，第125页。

③ 参看《〈法兰西内战〉初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76页。

④⑦ 《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62、361页。

⑤⑥ 《巴黎公社史料辑要》，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27、226页。



社会主义的坟墓，但同时也是新的（对法国来说）国际共产主义的摇篮。”^①“虽然蒲鲁东主义者在公社中有许多代表，可是根据蒲鲁东的方案来清算旧社会或组织经济力量的尝试却一点也不曾做过。恰恰相反，公社莫大的荣幸，就在于它的一切经济措施的‘活的灵魂’不是由什么原则，而是由简单的实际需要所构成。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些措施——废除面包工人的夜工、禁止工厂罚款、没收停业工厂和作坊并将其交给工人团体——一点不合乎蒲鲁东的精神，而合乎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②列宁说：“不管布朗基和蒲鲁东的荒谬理论和错误怎样，群众究竟把整个运动提到了更高的阶段。”^③

粉碎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最主要的内容，这是巴黎公社最主要的经验。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形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分水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议会痴呆症”和“无产阶级专政恐惧病”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列宁和斯大林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现在，世界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正在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和平过渡”、“全民国家”等等反动言行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借口时代的变化，宣传不粉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无产阶级也可以夺取政权，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也可以建设社会主义的骗人鬼话。

从巴黎公社起义到现在，这九十多年中，世界上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无论那

一方面的变化，都不可能改变资产阶级反社会主义的本性。资本主义制度越是临近死亡，资产阶级就越是千方百计地加强自己的国家机器，进行垂死挣扎。以美国为例，它在一八七一年只有军队四万二千多人，现在竟达二百六十多万人。这支军队和俾斯麦、拿破仑第三、梯也尔的军队比较起来，不仅在人数上庞大几倍或几十倍，在装备上精良几百倍，而且在反动程度上穷凶极恶几千倍。它充当着国际宪兵的角色，既想扼杀美国的革命运动，又想扼杀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在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空前庞大、空前反动的条件下，在资产阶级用武装颠覆，用和平演变，用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疯狂地破坏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条件下，宣传所谓不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也可以夺取政权，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也可以建设社会主义，就是宣传假革命、真投降，就是贩卖假社会主义，维护真资本主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正是贩卖假革命、假社会主义的掮客。

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必须防止自己的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无产阶级国家机关的干部，一律废除高薪、兼薪，不得享有任何特权

怎样防止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发生

- ① 恩格斯：《1884年10月29日给倍倍尔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91页。
- ② 《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97页。
- ③ 《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03页。



蜕化变质？巴黎公社在这个问题上做过一些探索，采取了一些虽然是初步的但意义极其深远的措施，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

恩格斯说：“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六千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议机构的代表规定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①

人民群众是巴黎公社的真正主人。公社存在的期间，群众广泛地组织起来，他们在自己的组织里讨论国家大事，每天都有两万左右积极分子出席俱乐部会议，对社会政治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提出倡议或批评。他们还通过向革命报刊投稿写信等方式，提出自己的愿望和要求。人民群众这种革命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公社力量的源泉。

巴黎公社的委员很注意倾听群众的意见，他们出席群众的各种会议，研究群众的来信。公社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在给公社秘书的通知里说：“我们每天收到大批口头和书面的建议，其中有些是个人提出的，有些是在俱乐部或在国际支部通过的。这往往是一些很好的建议，应该提交公社审查。”^② 公社确

实是认真考虑并采纳了群众的建议，公社许多著名的法令，诸如废除公职人员的高薪制、取消欠缴的房租、实行非宗教教育、禁止面包工人夜间劳动等等，都是以人民群众的建议为基础的。

人民群众还对公社的委员、公社的工作进行了认真的监督。第三区公社俱乐部在—项决议中说：“人民在当家作主……，如果你们选出来的人表现动摇或停滞不前的话，请把他们推向前进，以便达到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也就是争取我们的权利、巩固共和国、使正义事业获得胜利。”群众批评公社没有采取坚决的措施对付反革命、逃兵和叛徒，没有及时施行自己通过的法令以及委员中的某些不团结现象。例如，四月二十七日《杜歇老爹报》上发表的一封读者来信说：“请经常推动一下公社委员，请他们不要打瞌睡，不要拖延实行自己的法令。让他们永远避免私人纷争，因为只有他们意见一致，他们才有更大的力量来保卫公社。”

撤换、罢免违反人民利益的被选举者，也并非一句空话。公社撤了布朗舍的委员职务，因为他当过僧侣、商人、密探，巴黎被困时暗藏在国民自卫军中，并用假名混进公社。公社撤了克吕泽烈的军事代表职务，因为他“玩忽职守……几乎丢失伊西炮台”。在这之前，叛徒留尔耶也被国民自卫军中央委

^① 《〈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28页。

^② 《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1卷，第556页。



员会撤职并逮捕。

巴黎公社坚决废除国家机关干部的任何特权，特别是在工资方面做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改革。

我们知道，剥削阶级国家为了培养一批高高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总是给官吏以优厚的待遇和种种特权。高官厚禄，横行霸道，这就是剥削阶级官吏的写照。就拿法国第二帝国时期来说，当时官吏的年薪是：国会议员三万法郎，部长五万法郎，枢密院委员十万法郎，国务参事十三万法郎。如果一个人挂几个官衔，收入就更多，拿破仑第三宠臣鲁埃，身兼议员、枢密院委员、国务参事三职，每年薪俸二十六万法郎，相当于巴黎一个熟练工人一百五十年的收入。至于拿破仑第三，每年由国库拨给两千五百万法郎，外加各种津贴，总共为三千万法郎。

法国无产阶级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在巴黎公社成立以前，就多次提出废除官员高薪制的要求。巴黎公社成立后，实现了劳动人民的这个宿愿。四月一日，颁布了规定公职人员最高年薪为六千法郎的著名法令。法令指出：以前“各公共机关里的高级职位由于所得高薪而往往成为钻营的对象，并按谋职者的后台势力来分配”，而“在真正的民主共和国里，既不应该有高薪的闲职，也不应该有过高的薪额”^①。年薪六千法郎，这相当于当时法国熟练工人的工资。据著名科学家赫胥黎计算，这种薪额只略高于伦敦国民教育局秘书工资的五分之一。

巴黎公社还禁止公职人员在兼职时取兼薪。五月十九日的决议说：“鉴于在公社制度下，每种职务都有一定的报酬，其数额足以保障供职者的生活和操守。……公社决定：禁止一切兼职兼薪；公社公职人员除从事其本身工作外应当协助其他方面的工作，但无权另得任何报酬。”^②

巴黎公社在取消高薪、禁止兼薪的同时，还提高低薪，缩小工资差距。以邮局为例，低薪每年从八百法郎提高到一千二百法郎，增加百分之五十；高薪从每年一万二千法郎降为六千法郎，降低一半。为了保障低薪人员的生活，公社还明文禁止一切形式的扣款和罚款。

公社委员们模范地执行了公社关于废除特权、取消高薪兼薪的规定。公社邮政局负责人、公社委员泰斯，按规定应领月薪五百法郎，但他只领取四百五十法郎。公社将领符卢勃列斯基放弃了将官薪俸，拒绝迁到拨给他的耶利谢伊宫，并说：“将军的住处只能在士兵当中”。

巴黎公社执行委员会还通过了取消将军军衔的决议。该委员会在四月六日的决议里说：“考虑到将军的军衔跟国民自卫军的民主组织原则不相容，兹决定：取消将军军衔”^③。可惜，这个决议没有贯彻下去。

① 《法兰西共和国公报》，1871年4月2日。见《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1卷，第103页。

② 《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2卷，第484页。（译文略有更动）

③ 《法兰西共和国公报》，1871年4月8日。



国家领导人只领取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他们有多干工作的义务，没有多拿报酬的权利，更没有任何特权。这是破天荒的创举，其伟大意义不仅在于真正实现了“廉价政府”的口号；不仅在于扫除了剥削阶级用以愚弄人民的所谓国务活动的“神秘性”、“特殊性”，把国务活动变成工人职务的一种，把国家机关干部变成使用“特种工具”的工人；而且在于从物质待遇方面提供防止国家机关干部发生蜕化变质的条件。列宁说：“一切政权机关不仅通过选举产生，不仅随时可以撤换，而且它们的劳动报酬不是同‘老爷’一样，不是同资产阶级一样，而是同工人一样，——这就是工人阶级的理想。”^①他又说：“取消支付给官吏的一切办公费和一切金钱特权，把国家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这里恰巧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转变：从资产阶级的民主制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制，从压迫者的民主制转变为被压迫阶级的民主制，从国家这个镇压一定阶级的‘特别力量’转变为由人民大多数——工人和农民用共同的力量来镇压压迫者。正是在这特别明显的一点上，也许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上，人们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干干净净！……把这一点看作已经过时的‘幼稚行为’，‘照例’不讲它”^②。

确实如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领导集团，正是把巴黎公社的这一条重要经验忘得干干净净。他们追求特权，利用特权地位，化公为私，侵吞人民的劳动果实，占有高过一般

工农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这些人从政治立场到生活方式，都是背向劳动人民，面向资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官僚看齐。他们还用高工资、高奖励、高稿酬、高津贴以及花样繁多的捞钱办法，大力培植高薪特权阶层，力图加强自己统治的社会基础。他们大肆鼓吹“物质刺激”，说什么“卢布是强有力的火车头”，应该“用卢布来教育人们”，企图用金钱腐蚀人民的革命意志。把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所作所为，和他们心目中的巴黎公社的“幼稚行为”比较一下，人们就可以清楚看出，什么是人民的公仆，什么是人民的老爷，什么是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恩格斯曾说过：“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③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你们想知道蜕化变质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统治下的苏联的“全民国家”。

无产阶级必须警惕敌人的假和谈、真备战，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

巴黎公社的伟大启示，既包括许多宝贵的经验，也包括许多沉痛的教训。

公社是由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分担领导的，这两派都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都

① 《论无产阶级的民警》，《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54页。

②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407页。

③ 《〈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29页。



不懂得马克思主义，都缺乏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他们在无产阶级的推动下，做了一些正确的事情，他们也由于自觉性不够，犯了许多错误。其中主要错误之一是，上了敌人的假和谈真备战的当，没有乘胜追歼穷寇，让敌人有机会利用假谈判争取喘息时间、重新组织力量进行反扑，坐失扩大革命胜利的时机。

一切剥削阶级历来交替使用或同时并用暴力镇压与和平欺骗的反革命两手策略。当他们还没有作好向人民进攻的充分准备或遭到革命力量打击时，往往玩弄“和平”阴谋欺骗人民；一旦他们自认为有力量战胜革命人民时，就挥舞屠刀进行血腥的屠杀。梯也尔就是用这种反革命的两手对付巴黎公社的。

梯也尔仓惶逃往凡尔赛以后，只剩下一万五、六千名军警，这些士气低落、为数不多的残兵败将，根本不是在数量上、斗志上都占有很大优势的巴黎工人武装的对手。何况，巴黎和凡尔赛两地相距十八公里，巴黎工人武装完全可能朝发而夕至。梯也尔在讲到当时的情况时也不得不承认说：“这是我一生最不好过的日子。巴黎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凡尔赛完蛋了。只要我们一到，士兵就会举枪投降。’我确信不至于如此；不过，只要向我们进攻的敌人有七、八万人，我也不敢担保说我的军队是可靠的，因为军队会由于数量相差悬殊而发生动摇。”^①于是，老奸巨滑的梯也尔为了争取在凡尔赛站住脚跟，为了争取更多时间重新组织反革命力量，

就大搞“谈判”阴谋，大放“和平”烟幕。

梯也尔首先指示巴黎各区区长，抓住公社选举问题同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谈判，尽量纠缠，拖延时间，转移中央委员会的注意力，直到凡尔赛准备好进攻为止。这时国民议会也表示同意进行巴黎市政选举，和区长的谈判阴谋配合。谈判一直拖了八天，公社选举日期一延再延。凡尔赛得到了喘息，巴黎公社却错过了直捣反革命巢穴的时机。事后，区长们道出了假谈判真备战的真象。吉拉尔说：“我们采取这种反对立场所要达到的主要目的是阻挠巴黎公社的军队进军凡尔赛。……我们在这几天进行反抗，就使政府可以做好防御的准备。”^②德马列也说：“我认为我有继续冒险的必要，以便使凡尔赛政府赢得时间来武装自己。”^③

其次，梯也尔高唱“不干涉巴黎”的“和平”高调，打起“保护共和国”的幌子。马克思说：梯也尔一开始就竭力想在进行反对巴黎的强盗战争的同时，“演出一出议和的小滑稽剧……”。三月二十一日，即在梯也尔还没有军队的时候，他向国民议会声明说：“无论如何，我决不派军队到巴黎去。”三月二十七日，他又声明说：“我发现共和国已是既成事实，所以我断然决定要保护它。”^④梯

① 《巴黎公社史料辑要》，第206—207页。

② 参看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第301页。

③ 参看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30页。

④ 《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72页。



也尔这种做法，是想把老共和分子搜罗到自己的周围，并为自己的反动政权涂脂抹粉；是想蒙蔽外省视听，拉拢中等阶级；是想麻痹巴黎，孤立无产阶级。他的所谓“不干涉”背后隐藏着最大的杀机，他的所谓“保护共和国”就是准备消灭无产阶级共和国的另一种说法。

在大搞“谈判”阴谋、大放“和平”烟幕的同时，梯也尔极力准备武装镇压的一手。他搜罗残兵败将，向俾斯麦乞求放回法国战俘，并派人在战俘中进行反对公社的宣传和训练；他根据进攻巴黎的需要，建立了宪兵队、骑兵队和炮兵队；他向巴黎派遣大量的间谍，收集军事情报；他组织对巴黎的围困，在巴黎周围修工事、筑炮台；他开动宣传机器，大肆诬蔑巴黎公社，为镇压起义作舆论准备。凡尔赛经过半个月的多方准备，就在四月初开始向巴黎发动武装进攻。

从四月初到五月初，梯也尔的军事力量仍然比较薄弱。普鲁士释放的战俘不多，军事进攻进展不快，战胜巴黎的把握不大。因此，梯也尔在这段时间一边打，一边继续玩弄和平欺骗。他一方面，疯狂地屠杀公社战士，要求普鲁士更多的增援；另一方面，又利用“巴黎权利共和同盟”之类的资产阶级团体的所谓调解进行诱降，企图诱骗公社放下武器，交出政权，取得战场上尚未取得的胜利。例如，四月二十七日他在议会上说：“我要再三重复说：让那些举起渎神武器的人放下他们的武器吧，那我们就会立即停止惩罚来缔

结和约，只有那一小撮罪犯需另当别论。”^①五月八日他还对劝他议和的中等阶级代表团说：“只要暴乱者同意投降，巴黎的城门就可以对一切人洞开一个星期，只有杀害克列芒·托马和勒康特两将军的凶手除外。”^②

但是，到了五月中旬，普鲁士又释放了很多战俘，凡尔赛组成一支数达十三万的军队，麦克马洪向梯也尔保证可以很快打进巴黎，这时，梯也尔就把“和平”、“谈判”、“不干涉”等等幌子，扔得干干净净，他马上向国民议会声明，说他“将手持法律走进巴黎，迫使那些洒流了士兵鲜血和毁坏了公共纪念物的恶棍们全部抵偿自己的罪责”^③。他叫嚷：“我是不会留情的！赎罪应该不打折扣，审判应该严酷无情！”^④他对自己的那些波拿巴强盗们声明说，政府允许他们任意向巴黎报复。

巴黎公社委员对于梯也尔的反革命的两手策略认识并不一致。多数人对反动阶级的本性认识模糊，存在着和平幻想。巴黎起义胜利以后，一些中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就宣传通过选举实现国内和平，说什么“选举比杀人要好一些……”。只有一致的、庄严的、占压倒优势的选举才能有助于斗争，才能使劳动者得到保障”^⑤。说什么“只有选举才能

①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74页。

②③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76页。

④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80页。

⑤ 参看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第310页。



使人们的头脑冷静，才能使大街上平安无事，才能恢复信任、保证安全、建立正规的行政机构，最后，才能终止在血泊中毁灭共和国的仇杀”^①。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也强调“要温和”，“要宽宏大量”，要把“两个光辉的大字：博爱”作为自己的行动口号。他们错误地认为，通过投票建立公社，可能避免内战。于是一方面下令拆除街垒，一方面开展选举的准备工作，并就选举的日期、程序、办法以及其他技术性问题，同巴黎各区长进行多次谈判。

但是，选票并没有化干戈为玉帛的魔力。它既没有“使大街上平安无事”，更没有“使劳动者得到保障”。恰恰相反，忙于选举、忙于谈判的巴黎，失掉了加强革命力量的时机，忽略了扩大革命胜利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它没有封闭首都城门或控制交通，让反动分子随意进出；没有彻底镇压反革命活动；没有占领法兰西银行；没有进攻凡尔赛等等。而凡尔赛却得到了加强反革命力量的时机，作了进攻巴黎的种种准备。

有一部分公社委员看穿了梯也尔的反革命两手策略，他们对梯也尔玩弄的和平阴谋进行了揭露，对于资产阶级团体散布的妥协和解的幻想和公社内部的和平麻痹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例如，在五月四日的公社委员会上，公社委员巴斯卡尔·格鲁塞说：“公民们，情况是十分严重的。……因为反动派戴着和解的假面具已经好几个星期了，而这个假面具还没有被戳破。”^②“在凡尔赛政

府屡次发表声明之后继续谈论和解，在炮声隆隆和我们的弟兄被凡尔赛凶手们的子弹打死的时候高谈和解，这就是彻头彻尾的背叛，这就是削弱巴黎的防务，这就是怂恿公民表现软弱和临阵脱逃。实际上，这也就是议论投降和失败。”^③革命报纸和群众团体也纷纷揭露反革命的“和谈”阴谋，批判和解幻想。《保卫巴黎和救护伤员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声明》严正指出：“不，巴黎的劳动妇女所要求的不是这种和平，而是战斗到底！在今天，媾和就是背叛！……就是背弃劳动者自身的解放！”^④俱乐部始终坚决反对妥协，不许妥协分子出席会议，有的还派代表团向公社声明：谁要是主张同凡尔赛停战，谁就要被宣布为叛徒。可惜，这些正确的意见并没有完全被接受，一直到凡尔赛匪徒开始向巴黎进攻时，还有许多人没有觉悟，还在醉心于公社委员的补选工作。当时这种情况的目击者利沙加勒写道：“全巴黎都倾听着炮火的疯狂轰击。没有人想到会有这样一次攻击，从二十八日以来，人们就生活在一种盲目的信任中——毫无疑问，这是礼炮，从最坏方面着想也不过是一场误会。”^⑤等到发现这不是什么误会，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进攻时，尽管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抵抗，但因政治上、军事上准备不足，已为时晚矣！

① 参看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第310页。

②③ 《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2卷，第138页。

④ 《巴黎公社史料辑要》，第35页。

⑤ 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第171页。



凡尔赛在磨刀，巴黎在投票；凡尔赛在备战，巴黎在谈判。结果，凡尔赛匪徒手执屠刀攻进巴黎。他们枪杀被俘的公社委员和士兵，枪杀教堂里的避难群众，枪杀医院里的伤兵；他们枪杀年老的工人，说这些人多次造反，“罪恶”深重；他们枪杀女工，说这些人是所谓“卖油女”——纵火犯，“只有死后才像个女人”；他们枪杀童工，说这些人“长大后必定是暴徒”。他们把这场叫作“打猎”的大屠杀，延续了整整一个六月。巴黎到处是尸体，塞纳河里出现了一条血流，公社被淹没在血海之中。三万多人被屠杀，十多万人被判刑或被迫逃亡，凡尔赛就是这样“报答”巴黎的“仁慈”和“宽大”的，就是这样结束他们的假谈判真备战的骗局的。这是一次极其沉痛的血的教训。这个血的教训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穷寇，一定要追歼，落水狗，一定要打死，决不能给敌人任何喘息的机会。

如果说，九十五年前，巴黎公社的一大部分委员没有及时识破梯也尔的假谈判真备战的阴谋，主要是由于经验不足、认识不清的话；那么现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处处为美帝国主义的假和平真侵略效劳，就决不是什么认识问题，而完全是站在叛徒的立场上，伙同美帝国主义者，企图用反革命两手，扼杀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但是，时代在前进，人民在前进，革命

在前进。革命的人民越来越懂得，如何用革命的两手去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如何将革命进行到底。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和一切反动派，连同他们的形形色色的反革命两手阴谋，终究是要被人民干净、彻底、全部地扔进历史的垃圾箱里去。

* * *

恩格斯在纪念巴黎公社二十一周年时说：“让资产者去庆祝他们的七月十四日或九月二十二日吧。无产阶级的节日将到处永远都是三月十八日。”^①

现在，当我们纪念无产阶级的节日——巴黎公社起义九十五周年时，环顾全球，看到的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伟大革命局面。历史雄辩地证实了马克思在九十五年前的预言：“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②“巴黎公社可能倒下，但是它所创始的**社会革命**必将胜利。它的策源地遍于全球。”^③

① 《巴黎公社二十一周年给法国工人的贺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31页。

② 《卡·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77页。

③ 《〈法兰西内战〉二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50页。



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

戚本禹 林 杰 阎长贵

近几年，我国史学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是尖锐的。这是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潮流，冲击着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所有制服务的旧史学。无产阶级的史学工作者，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形势下，向旧的、传统的历史观点展开了斗争。这样，就使得一些坚持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史学方向的历史学家们如坐针毡。他们感到自己安身立命的东西摇摇欲坠了，非起来抗争不可。

于是，史学领域里以无产阶级为一方，以资产阶级为另一方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尖锐起来了。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的辩论，一直在进行着。这一次由批判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而展开的关于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中国农民战争、历史人物评价、“让步政策”等问题的大论战，又为史学革命开创了空前生动、活泼的局面。

这一场大论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在史学领域里的一场大斗争；是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在史学领

域里清除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毛泽东同志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①当前史学领域里的这场大论战，就是坚持还是反对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观点来对待历史问题的论战，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论战。

在史学领域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坚持历史唯心主义，坚持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史学方向的一方，吴晗同志是一个挂帅的人物。此帅之外，还有一帅，这就是翦伯赞同志。

长期以来，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自居的翦伯赞同志，就史学理论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写了不少文章。这些文章被一些人认为是

^①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91页。



历史研究中带有指导性的文件。重要的有：

《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

《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

《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

《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

《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怎样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①

其中特别是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发表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和《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系统地论述了他的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历史观点。这是两篇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

由于他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号，颇具有迷惑人的作用。为了分清是非，辨明真理，就翦伯赞同志历史观点中的一些主要问题，认真进行一番讨论，对于目前正在进行的史学革命是非常必要的。

所谓“历史主义”究竟是什么？

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都不能认识人类社会历史运动及其规律。他们把历史一会儿说成是偶然现象的堆积，一会儿说成是上帝的事先安排；一会儿说成是帝王将相的善良本性的发现，一会儿又说成是暴君的罪恶活动。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所以把历史歪曲成荒诞不经、混乱不堪的东西，主要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利益，使他们不可能科学地、客观地去观察历史事变。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第一次科学地揭露了历史的真相，发现了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这就是阶级斗争

规律。

马克思列宁主义把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归结为阶级的活动。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历史上发生的一切斗争，不论是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都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反对压迫、剥削阶级的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日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这就迫使那些具有顽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历史学家，不得不改变反对的方式。

翦伯赞同志就是这样做的。他抛弃了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来歪曲历史唯物主义，来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对抗。

一九五二年，翦伯赞同志就提出了所谓“历史主义”。但是，把“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完整的思想体系来大肆宣传，那是近年来的事情。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他在北京、南京、上海、苏州等地到处宣传他的“历史主义”，要用所谓“历史主义”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

翦伯赞同志为什么要大讲特讲“历史主义”呢？因为在他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有片面性，不能完全用它来解释历史。他说：“除了阶级观点以外，还要有历史主义”。“必须把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结合

^① 这些文章，分别见：《历史问题论丛》（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62年新1版。1952年9月号《新建设》。1959年第10期《红旗》。1961年12月22日《光明日报》。1962年6月号《江海学刊》。1962年5月18日《文汇报》。



起来。如果只有阶级观点而忘记了历史主义，就容易片面地否定一切；只有历史主义而忘记了阶级观点，就容易片面地肯定一切。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对历史事实作出全面的公平的论断”。^①显然，他的“历史主义”是把阶级斗争观点排除在外的。

翦伯赞同志说，有的同志“为了站稳阶级立场”，把“中国古代史说成了黑漆一团，说成是一堆垃圾，说成是罪恶堆积。其所以如此，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只是因为古代史都是阶级社会的历史”。“有些同志简直用阶级成分作为评论历史人物的标准。很多历史人物之所以被否定，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出身于地主阶级”。^②

说无产阶级史学工作者把中国历史说成了“黑漆一团”，这是污蔑。翦伯赞同志的真正意思是说，阶级斗争观点要不得，用阶级斗争观点来分析历史，把历史看做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就会把历史说成是“罪恶堆积”。在翦伯赞同志看来，用阶级分析方法去评论历史人物，就是把阶级成分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就会把封建阶级的历史人物否定掉。

“为了站稳立场，讲历史上的矛盾，只讲敌对阶级间的矛盾，不讲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历史，历史就太简单了，简单到任何矛盾也没有了。”^③这是翦伯赞同志对阶级斗争观点的又一个攻击。

是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主张用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奴隶同奴隶主、农民同地主、工人同资本家这种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

来解释历史现象。翦伯赞同志说，不行，如果讲历史上的矛盾，只讲这个，历史就“太简单了，简单到任何矛盾也没有了”。按照翦伯赞同志的观点，讲历史应该复杂一点，复杂到分不清阶级界限。他所以要大讲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就是要用这种矛盾来冲淡或者代替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

翦伯赞同志给用阶级斗争观点来解释历史的同志扣了许多帽子，什么“虚无主义”、“非历史主义”、“简单化”、“片面性”、“否定一切”，等等。但是，最大的帽子还是“教条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翦伯赞同志却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口号下，大肆反对用阶级斗争观点来研究历史。他说：“空空洞洞说一些原理原则”，“干巴巴引用一些教条”，“只讲普遍真理、一般原则，不结合自己历史的特点，这种教条主义”，“应该反对”。^④

翦伯赞同志讲了不少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话，口头上也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是把阶级斗争观点除外。这是一种挖心战术。他所反对的恰恰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阶级斗争观点。

翦伯赞同志把所谓“历史主义”奉为研究历史必须“严格”遵循的法则。其实，他所说的“历史主义”，乃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破烂武器。翦

①②③④ 《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1962年6月号《江海学刊》。



伯赞同志不过是给它涂了一点金黄颜色，就拿来到处挥舞。

我们且不说现在世界上大谈“历史主义”的究竟是些什么人。从历史上说，最早用“历史主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观点的，是十九世纪意大利的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克罗齐。他认为“唯一的实在性，就是流动性”，就是“精神”，并且宣称这就是“历史主义”。资产阶级的许多哲学派别，如新康德主义、实用主义、存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也都恶毒地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例如，逻辑实证主义者坡培尔即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是“一种危险的过份简单化的观点”，只“承认贫富之间的分歧始终具有基本的重要性”，“把一切政治冲突都错误地解释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斗争”，而否认“教皇和皇帝之间的斗争”，否认“统治阶级内部分裂”。^①臭名远扬的实用主义者杜威，他表面上也承认“历史是一个变化过程”，但他坚决反对历史变化的动力是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观点污蔑为“教条式的历史哲学”。^②

人们有理由说，翦伯赞同志的所谓“历史主义”，同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理论如出一辙，他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观点的资产阶级学者们是站在一起的。

歪曲和污蔑农民革命

毛泽东同志一贯热情地歌颂历史上的农民，歌颂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他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

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③因此，怎样对待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这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是一个根本态度、根本立场的问题。恰恰在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上，翦伯赞同志打着“应该历史主义地对待农民战争”的幌子，不止一次地宣传：

“农民反对封建压迫、剥削，但没有，也不可能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来反对。

“农民反对地主，但没有，也不可能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

“农民反对皇帝，但没有，也不可能把皇权当作一个主义来反对”^④。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在翦伯赞同志看来，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反对封建压迫、剥削，并不是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地主，并不是反对地主阶级。翦伯赞同志对历史上的农民，对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观点，完全暴露了他所说的“历史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

请问：为什么反对封建压迫、剥削，不是反对封建制度呢？难道封建压迫、剥削不就是封建制度的产物吗？为什么反对地主，不是反对地主阶级呢？难道地主阶级不就是由地主构成的吗？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农民阶级和地

① 《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

② 《自由主义与社会活动》。《杜威哲学文选》。

③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19页。

④ 《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1961年12月22日《光明日报》。



主阶级的矛盾。封建制度就是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农民阶级的制度。怎么能说，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不反对封建制度、不反对地主阶级呢？列宁说，战争，作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其目标“不是反对个人而是反对阶级”^①。毛泽东同志在论述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时候说：“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②。

翦伯赞同志之所以要在封建压迫、剥削和封建制度之间，在地主和地主阶级之间划一条界限，就是为了证明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不反对封建制度、不反对地主阶级。这种观点是对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歪曲和污蔑。

毛泽东同志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③按照翦伯赞同志的说法，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不反对封建制度，不反对地主阶级，那么还有什么理由把它叫做革命呢？难道把它叫做改良不是更合适吗？

所谓“农民反对皇帝，但没有，也不可能把皇权当作一个主义来反对。”如果这句话，指的是有时农民起义借用王朝的名义来号召，就认为起义农民不反对封建的皇权主义，这是只看形式，不看实质。马克思曾经指出：“拿破仑的名字在各个不同阶级的口中具有极不同的意义”^④。难道对农民起义借用王朝来号召的现象不应当像这样地进行阶级分析吗？如果这句话，指的是起义农民没有

自己的“主义”、自己的思想，这是否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否认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列宁说：“剥削的存在，永远会在被剥削者本身和个别‘知识分子’代表中间产生一些与这一制度相反的理想。”^⑤毛泽东同志说：“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⑥。请问：在封建社会里受剥削的农民，为什么不会产生反对封建制度的思想？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主义”呢？难道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中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均田免赋”等等，不是和封建的皇权主义根本对立的吗？

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地主阶级的性质，是由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决定的，而不是以当时农民是不是认识到这一点作为依据的。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发展成为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就是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地主阶级，当时农民认识到这一点是这样，认识不到这一点也是这样。反对封建压迫、剥削，就是反对封建制

-
- ① 《什么是“人民之友”》。《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77页。
- ②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9页。
- ③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8页。
- ④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1页。
- ⑤ 《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列宁全集》第1卷，第393—394页。
- ⑥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0页。



度，反对地主，就是反对地主阶级，农民认识到这一点是这样，认识不到这一点也是这样。

翦伯赞同志还说：“农民建立的政权，只能是封建性的政权”^①。这是对历史事实的严重歪曲。例如，黄巢起义建立过大齐政权，李自成起义建立过大顺政权，在这些政权所控制的地区里，“捕得官吏悉斩之”，“富家皆跪而趋”，“巨室膏田”没了主人；“穷棍”领回了“祖产”，“贫儿”、“奴仆下才”“广侵田宅，滥湮财货”，“兼并”了地主的“田园甲第”。这种使农民扬眉吐气，使地主逃跑死亡的政权，难道能是封建性政权吗？试问：历史上哪一个封建政权这样做过？

太平天国革命是农民战争发展的高峰。它在建立农民政权方面，也最典型。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在《纪念太平天国革命百周年》的社论中说：太平天国“革命的英雄们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组织了强大的武装，实行了各种革命政策，发动了广大农民为推翻封建的土地制度而斗争。”请问翦伯赞同志：如果农民只能建立封建性政权，你是否认为太平天国和清王朝一样是封建性的政权呢？

封建社会的农民，以自己的生产活动创造了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他们反对地主阶级的革命斗争推动了历史发展，构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前奏。正因为他们有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地主阶级的革命性，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够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同工人阶级结成巩固的联盟，成为革命

和建设的主力军。按照翦伯赞同志的说法，封建社会的农民是不反对封建制度、不反对地主阶级的，没有革命性，那么，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怎么能够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呢？

美化和歌颂帝王将相

翦伯赞同志一方面用他的“历史主义”歪曲和污蔑历史上的农民和农民革命；另一方面，又用他的“历史主义”大肆美化和歌颂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和封建制度。

一九五八年，史学战线上掀起了一场大破帝王将相主宰历史，大写劳动人民历史的轰轰烈烈的史学革命运动。翦伯赞同志在这个革命运动面前再也“忍耐”不住了，于是挺身而出，为保卫帝王将相而战。

翦伯赞同志认为，必须承认和肯定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开运河的功劳。他说：“筑长城、治黄河、开运河都是当时的劳动人民的劳动。秦始皇没有挑土，汉武帝没有筑堤，隋炀帝没有挖河，但是他们却是这些巨大工程的发动者、组织者”^②。这就是说，筑长城、开运河，虽然是劳动人民的劳动，但是秦始皇、隋炀帝是发动者和组织者，必须承认和肯定他们的功劳。

毛泽东同志说：在封建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

^① 《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

^② 《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1958年第10期《红旗》。



本的阶级。”^①在我国历史上，长城也好，黄河也好，运河也好，究竟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是劳动人民的功劳，还是秦始皇、隋炀帝等创造的，是这些皇帝的功劳？翦伯赞同志把这些巨大工程的功劳也要记在秦始皇、隋炀帝的头上，这和毛泽东同志的观点难道不是背道而驰吗？

特别是像隋炀帝，连地主阶级的历史学家都不敢替他说好话，认为他“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茫茫九土，并为麋鹿之场，慄慄黔黎，俱充蛇豕之饵”。^②而翦伯赞同志竟把这样一个荒淫无耻的皇帝当作挖运河的“发动者、组织者”加以歌颂，这就是翦伯赞同志的“历史主义”！

能不能够说由于隋炀帝是开运河的“发动者、组织者”，因而就应该把功劳写在他的账上，加以肯定、加以歌颂呢？当然不能。

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我们不能把剥削阶级所兴修的水利、所创办的事业，都一律看待。但是，那些直接为剥削和压迫人民服务的工程，其政治目的必须坚决揭露。而翦伯赞同志完全掩盖了隋炀帝修运河的阶级本质，把对人民的剥削和镇压说成是给人民办好事，这是完全错误的。

翦伯赞同志吹捧地主阶级的帝王将相还有一个理由，即认为剥削阶级在上升阶段时，只能歌颂，不能批判。他说：“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来”，“当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阶级的时候，它是一个革命阶级。只有当这些阶级走向没落的时候，当这些制度走

向崩溃的时候，才是反动的，该骂的，该反的。如果当这个阶级、这个制度一出现于历史就反对它们，岂不是反对历史的发展。”“只有站在奴隶主的立场，才能反对新出现的封建制”。^③

这是什么“历史主义”呢？这就是反对阶级分析的“历史主义”。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剥削阶级无论在什么时候，对于劳动人民来说，始终是剥削者和压迫者。对这种剥削和压迫，有什么理由不准反、不准骂？中国的封建社会，一般认为是从唐宋开始走下坡路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在一八七一年伟大的巴黎公社革命之后走向没落的。按照翦伯赞同志的观点，在唐宋以前，中国的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巴黎公社以前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就根本不能反对。谁如果反对，就是反“历史主义”。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说，唐宋前农民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如秦末农民起义、汉末黄巾起义等等，都是反对历史的发展，都是站在奴隶主的立场反对新出现的封建制度。同样，巴黎公社以前的法国、英国、德国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也都是反对历史的发展，都是触犯翦伯赞同志的“历史主义”的，因而都是错误的。

也许有人认为，翦伯赞同志美化帝王将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4页。

② 《隋书·帝纪》。

③ 《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相，似乎是有条件的，他只是歌颂历史上那些所谓对人民有功劳的帝王，只是歌颂处于上升阶段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是不是这样呢？不是。实际上，凡是地主、资产阶级，翦伯赞同志都是毫无例外地肯定。他指责所谓“非历史主义”者，“对于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帝王将相，即使要肯定他们，也得先骂他们几句，或者在肯定以后，又加以否定。好像不如此，就会丧失阶级立场。”^①这就是说，对于帝王将相，即使要批判几句也不行，也不能既肯定又否定，只许向帝王将相高唱赞歌，顶礼膜拜，而不准说半个“否”字。你看，他对帝王将相是多么爱护备至！

翦伯赞同志歌颂帝王将相，有一个自以为是是非常重要的理论根据，就是：帝王将相用法律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利。他说：封建帝王的任务，“重要的是用法律制度去保障广大人民的生存权利，而不是替个别的人民去伸冤”^②。这就是说，在翦伯赞同志看来，封建帝王不仅能够替“个别的人民”伸冤，而且能够用法律制度去保障广大人民的生存权利。

封建帝王替人民伸冤，根据翦伯赞同志的“历史主义”观点，是当然的事。但是，且慢，请问帝王替人民究竟伸的什么冤？伸那个阶级的冤？历史上有这样的事吗？那怕有一件也算。什么是封建的法律制度呢？封建的法律制度就是维护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政治制度。要求帝王用地主阶级的法律

制度去保障“广大人民”的生存权利，这到底是什么高深的理论呢？这是把帝王及地主阶级的国家和法律都当作超阶级的偶像来崇拜。

翦伯赞同志大叫要用“历史主义”去评价历史人物。其实，他不仅用资产阶级历史主义去反对阶级分析方法，美化帝王将相，而且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和法的理论，把国家和法当作调和阶级矛盾的工具来歌颂。

是“让步政策”，还是反攻倒算？

为了美化帝王将相，对帝王将相歌功颂德，为了贬低农民革命，否认农民革命的历史作用，翦伯赞同志还一直大肆宣扬封建统治者曾经对农民实行过减轻剥削和压迫的“让步政策”。

一九五一年二月，翦伯赞同志就提出了统治阶级对农民“让步”的理论。他在《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公式：农民战争——统治阶级的让步——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他说：“在每一次大暴动之后，新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这就是说必须或多或少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这样就减轻了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拘束，使得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又

^① 《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② 《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1959年第21期《戏剧报》。



有继续发展的可能，这样就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①一九五六年，翦伯赞、邵循正、胡华合编了《中国历史概要》，大讲“让步政策”。最近几年，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在宣扬“让步政策”方面更有所发展。原来还只是说每次大的农民暴动以后，统治阶级“让步”，现在却是每次农民暴动，甚至连很不出名的小规模起义，他都说“也逼令统治者不得不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措施”^②。很显然，在翦伯赞同志看来，正是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推动了历史的发展。翦伯赞同志宣扬的“让步政策”理论，是歪曲历史事实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不比不知道”。对古今中外的地主阶级我们也要做个比较。

我们先看看现代阶级斗争的情况。中国一九二七年大革命，规模不能算不大吧，对统治阶级的震动不能算不重吧，但是大革命失败以后，统治阶级对革命人民究竟实行了什么政策呢？是“让步政策”吗？是“减轻压迫和剥削”吗？不是，一万个不是。对此，我们许多革命老同志和革命群众还都记忆犹新。统治阶级加给革命人民的是屠刀、是牢狱，多少人死在统治阶级的屠刀之下，真是血流成河！多少人身陷囹圄，真是暗无天日！工农群众在革命中争得的一些权利，被统治阶级夺回去了，并且加重了负担。毛泽东同志在分析当时的形势时指出：“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

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③在这里，根本没有什么统治阶级的“让步”和“让步政策”，只有变本加厉地进攻和反攻倒算，只有白色恐怖！

我们再来看看外国封建社会里的地主阶级。德国一五二五年的农民战争，是一次规模很大、影响很深远的革命运动。这次农民战争失败以后，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了什么政策呢？是“让步政策”吗？是“减轻压迫和剥削”吗？不是，一万个不是。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中指出：“盖斯迈尔退到威尼斯地区以后，农民战争的最后一幕就告结束了。各处农民重新陷入他们的教会领主、贵族领主或城市贵族领主的奴役之中；各处和农民缔结的协定都被撕毁，胜利者对战败者极尽掠夺搜刮之能事，因而使一向承担的责任更加重了。”^④同样，在这里也只有封建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绝没有什么“让步

① 《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历史问题论丛》（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62年新1版，第117页。

② 《中国史纲要》中册，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90页。

③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9页。

④ 《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78页。



政策”。

“天下乌鸦一般黑”。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剥削和掠夺，不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剥削和掠夺。剥削和掠夺是地主阶级的本性。怎么能够设想地主阶级可以对农民阶级实行减轻压迫和剥削的“让步政策”呢？至于认为“让步政策”是地主阶级在农民革命失败以后实行的，这就更加荒唐了。这岂不是说，农民阶级在革命中都没有得到的东西，在失败以后反而得到了吗？

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革命，极端仇视，坚决镇压。当农民革命失败以后，地主阶级对革命农民只能反攻倒算，血腥镇压，绝不会有有什么“让步”，更不会有有什么“让步政策”。

西汉初年地主阶级实行的政策，是翦伯赞同志宣扬“让步政策”理论的第一个例子。他说：“经过了秦末农民大起义，新的统治者刘邦，为了恢复封建秩序，不得不向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除秦苛法就是最好的说明。”^①

翦伯赞同志所特别称道的“除秦苛法”，是不是对农民的“让步”呢？不是。

刘邦入关中，“约法三章”，这是“除秦苛法”吗？不。“约法三章”，所谓“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是保护地主阶级的法律，是反对农民革命的法律，是刘邦背叛农民革命的标志。农民革命，“杀”地主阶级、“伤”地主阶级、“盗”地主阶级（财产），这犯的

是那家的“法”？难道不是地主阶级的“法”！翦伯赞同志不去揭露它，反而歌颂它，这不是站在刘邦的立场上反对农民革命吗？

“除秦苛法”完全是骗人的鬼话。这是当时地主阶级用来诱骗人民，使之规规矩矩就地主阶级的法律之范的。地主阶级的法律是地主为农民准备的鞭子，它是专政的工具，绝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自称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翦伯赞同志，不去揭露汉初法律的阶级实质，却一再宣传那所谓的“除秦苛法”，这不是在帮助地主阶级继续欺骗人民吗？

翦伯赞同志说，由于汉初统治者实行了“让步政策”，到文景时代出现了“五谷丰熟，百姓足，仓廩实，蓄积有余”的现象^②。这种描绘完全是从地主阶级御用历史学家粉饰太平的陈词滥调中抄来的。封建社会是地主的天堂，农民的地狱。地主阶级越富，农民阶级越穷。地主阶级的富是建立在农民阶级的白骨上面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地主阶级国家的钱积得“贯朽而不可校”，粮食存得“腐败不可食”，农民仍然要卖儿鬻女，在死亡线上挣扎。对这一点，连当时的一些统治者也不否认。晁错给汉文帝上奏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

^{①②} 《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历史问题论丛》（增订本），第117、117—118页。



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妻子，以偿责者矣。”^① 翦伯赞同志对这些事实为什么讳莫如深呢？

举一反三，以此例彼。翦伯赞同志所说的各个朝代统治者对农民实行的“让步政策”，都是对地主阶级的美化，对封建社会的歌颂。

翦伯赞同志声称，他的“让步政策”理论，是对毛泽东同志关于封建社会农民革命理论的解释。^② 不是，绝对不是。

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翦伯赞同志却认为，阶级调和、阶级妥协推动了历史发展，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只有通过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才能表现出来。毛泽东同志说，历史发展的逻辑是：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翦伯赞同志却说，历史发展的逻辑是：农民战争——统治阶级的让步——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观点，怎么能说“让步政策”理论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观点的解释呢？

毛泽东同志指出：“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③ 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因此，必须坚持阶级斗争的理论，同阶级敌人进行

针锋相对的斗争，而不能幻想反动统治阶级会对人民作什么“让步”，实行“让步政策”。革命的人民决不能对敌人抱有丝毫的幻想。

结 束 语

解放初期，在史学领域里，虽然对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历史观点作了一些批判，但是，由于革命的史学工作队伍还在逐步形成过程中，批判的锋芒还不那么锐利。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猖狂进攻，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大肆宣扬“史料即史学”的资产阶级观点，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反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反对历史研究必须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他们宣扬“为历史而历史”，实际上是为个人主义，为个人的名利而研究历史。反右派斗争结束以后，革命的史学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史学革命运动。这个革命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坚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批判和改写全部历史，反对形形色色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历史观点。

这是一个充满着朝气的史学革命，方向对，干劲足，成绩大。革命批判精神得到了大发扬，旧的历史观点受到了批判。

正如列宁说的，马克思主义“在其生命

① 《资治通鉴》卷一五，《汉纪》七。

② 参见《历史问题论丛》（增订本），第409页。

③ 《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81—1182页。



的途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①，革命史学的发展也决不是平静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历史观点决不会自愿放弃它的统治地位，决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

强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力量，虽然经过斗争使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某些代表人物破产了，但是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在一定的条件下，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又会登台演出。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二年，由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背信弃义和严重的自然灾害，我国遭受暂时的经济困难。这时，史学领域同其他领域一样，资产阶级史学的代表人物以为有机可乘，他们就公开登台表演了。

翦伯赞同志以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对待史学革命，冷嘲热讽，挖苦打击。他到处讲演，发表文章，把刚开始不久的史学革命说得一无是处，甚至不惜捏造事实，攻击史学革命。一时史学界出现了一股反对史学革命的逆流。

翦伯赞同志对“以论带史”，即对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历史研究，大为不满。他说，“以论带史”的口号有片面性，“因而研究的全部艺术就在于多多益善地引用经典著作中的词句”，“愈空洞愈好，愈抽象愈好，愈枯燥愈好，在有一个时期似乎曾经成了一种风气”。^②他提出：“材料是知识的泉源”，“对于历史研究来说，书本上的知识是主要的。”^③这实际上就是重复了资产阶级的“史料即史学”的观点，来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抗。

针对历史研究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革命观点，翦伯赞同志提出“政治是替经济

服务的”，“经济是历史的骨干”，是“写历史的原则”。^④他指责有些同志“狭隘地理解历史学要为政治服务和历史学要结合实际以及古为今用等提法，几几乎把党的任何一个政策、号召、口号都塞到古代史中去”，并说“历史学为政治服务，不是配合当前的每一个政治运动”。^⑤

翦伯赞同志特别反对史学工作者必须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他反复地、不厌其烦地奚落“为了站稳立场”的史学工作者，说“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是“站在奴隶主的立场”上。^⑥

翦伯赞同志给史学革命竟然作了这样的总结：“总起来说，片面性、抽象性、简单化、绝对化、现代化，是这几年历史教学和研究中突出的缺点。”^⑦

总起来说，翦伯赞同志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就是“二反二保”的纲领，即：反对用阶级斗争观点解释历史，反对历史研究、历史教学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保护“史料即史学”、“为历史而历史”的资产阶级历史观点，保护美化帝王将相、丑化农民革命的封建王朝史学体系。这条史学纲领的遮羞布，就是老掉了牙的资产阶级历史主义。

这是现实的阶级斗争在史学领域里的反映。

为了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必须批判。

①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3页。

②③⑤⑥⑦ 《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④ 《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



焦裕禄同志是活学活用 毛泽东思想的好榜样

本刊评论员

焦裕禄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人民的忠实儿子，是各行各业领导干部的好榜样。

焦裕禄同志的不朽事迹吸引着每个人。日前全国掀起了学习焦裕禄同志的热潮。向焦裕禄同志学习，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已经成为各级干部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和要求。

向焦裕禄同志学习，最根本的是要学习他怎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宇宙观。革命工作者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来观察一切事物，改造一切事物，就能够具有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的无产阶级优秀品质。

焦裕禄同志把毛主席的书作为自己工作的最高指示，把学习毛泽东思想作为毕生的战斗任务，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他善于把毛泽东思想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坚决用毛泽东思想来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向焦裕禄同志学习，千条万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是第一条。必须紧紧抓住这一条，才能学到焦裕禄同志的优秀品质，才能把无产阶级宇宙观学到手。

焦裕禄同志是在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候，是在河南省兰考县人民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到兰考去工作的。焦裕禄同志究竟带着什么东西到兰考县去的呢？他既不是带着救济粮，也不是带着救济款，而是带着四卷《毛泽东选集》。他靠什么东西战胜重重困难，战胜内涝、风沙、盐碱三大灾害呢？一不靠天，二不靠地，靠的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靠的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人民群众。

当时，兰考县的工作千头万绪。在焦裕禄同志面前，摆着许多困难，存在许多矛盾。什么是主要矛盾？关键问题是什么？

有的人看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忙于发救济粮，放贷款，或者只是抓肥料，搞生产，却忘记了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必须抓阶级斗争这个纲，必须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焦裕禄同志对他们说：“光抓这些不行啊！首先得抓阶级斗争，抓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没有革命思想，咋着也搞不好生产。抓思想，就要多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



一九六三年，他在县委召开的四级干部会上说：“我们不能在政治上生锈，不能只抓生产救灾，不抓阶级斗争，不能只抓粮、棉、油，不抓敌、我、友。”

阶级斗争规律，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和实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由于焦裕禄同志在错综复杂的事物中，抓住了阶级斗争这个根本矛盾，于是就推动了兰考县历史的飞跃发展。

革命工作者总是经常会遇到困难的。在困难面前怎么办？有两种不同的态度。

一种人是，被困难吓倒，在困难面前直不起腰来，认为困难就是困难，永远是困难，从困难中看不见任何胜利和希望。这是懦夫懒汉的思想，是形而上学的宇宙观。

一种人则认为，困难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一样，具有两重性。困难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向顺利转化。这是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①焦裕禄同志不仅看到了“兰考是灾区，穷，困难多”，更重要的是，他在不利条件中看到了有利因素，看到了转化和发展。“梅花欢喜漫天雪”。他不是被困难所吓倒，而是伸开双手去欢迎它，立志在困难面前逞英雄。当他走访了兰考县的灾区之后，热情地高呼：“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兰考县的干部说：“新来的县委书记看问题高人一着棋”。他高就高在用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看问题，用毛泽东思想对待困难。

究竟依靠谁来战胜困难？依靠谁来战胜大自然所带来的严重灾害呢？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两种不同的态度。

有些人认为，战胜“三害”最重要的是依靠治水、治沙、治碱的技术措施，依靠国家的物质支援。他们见物不见人，看不到千百万劳动群众的力量。毛泽东同志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②焦裕禄同志运用毛泽东同志的这个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观察问题。他认为，能够战胜兰考灾害的决定性力量，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三十六万勤劳勇敢的兰考人民。

照某些人的看法，在灾荒面前，群众只是一群嗷嗷待哺的饥民，群众的要求就是救济。他们看不见群众内心的革命热情，看不见群众对战胜自然灾害的迫切要求，看不见群众战胜自然灾害的能力。这是缺乏群众观点的表现。

焦裕禄同志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信普通劳动者的聪明才智，坚信他们的革命首创精神。他最看得起的是像萧位芬那样的老贫农，他拜萧位芬为师，向萧位芬请教了三天三夜。

焦裕禄同志认为，在困难面前，“要干，要革命”，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战胜天灾，“欲与天公试比高”，这才是真正反映了广大群众的革命要求，这才是真正反映了群众的根本利益。

在遇到严重灾荒时，有的人认为，唯一的就是解决吃喝的问题，其他的一切都是空话。

① 《为人民服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04页。

②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516页。



焦裕禄同志坚决反对这种错误观点。他认为，战胜困难，最重要的是“人的革命意志”，是“人的革命品格”，首先是领导干部的“精神状态”。

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在严重的困难面前，如果思想上没有树立战胜敌人的革命勇气，没有克服困难的坚强毅力，那就不可能取得胜利。焦裕禄同志深深懂得，战胜灾害，首先必须抓思想工作。他认为，除“三害”，首先要除思想上的病害；特别是要对县委的干部进行抗灾的思想教育。正是由于他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突出政治，做好了政治思想工作，从而发动了群众，经过艰苦奋斗，战胜了自然灾害，迅速地改变了兰考县的落后面貌。

机械唯物论者只承认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否认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只承认物质变精神，不承认精神变物质。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①这是辩证的唯物论，彻底的唯物论。

焦裕禄同志向干部和群众反复宣传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辩证唯物论思想。他说：“要革生产的命，必须先革思想的命，有了一定物质基础，思想能变一切，什么样的思想，就做出什么样的结果。一种思想是：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坚持阶级路线，充分发动群众，敢想敢干和科学实验相结合，就能发挥巨大的力量，很快改变落后面貌；另一种思想是：没有认真学习和贯彻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项伟大革命的指示，思想落后于形势，工作落后于实际，看不到有利形势，看不到恢复发展生产的潜力，看不到群众要求改变面貌的积极性，工作中顾虑重重，小手小脚。抓不住阶级斗争这条纲，不能够贯彻阶级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虽然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或者原来的基础就较好，也会使生产下降”。

兰考县人民战胜自然灾害的事实说明，人们头脑中有战胜内涝、风沙、盐碱的坚强意志，通过实践，就可以转化为现实。人们的头脑中有了毛泽东思想，就可以产生粮食、棉花、油料等物质财富。焦裕禄同志说：“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里所说的“奇志”，就是毛泽东思想。

焦裕禄同志领导兰考人民同“三害”作斗争的胜利，是突出政治的胜利，是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辩证唯物论思想的胜利。一句话，是突出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一个是它的实践性。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性，就是说，它公开申明为无产阶级服务，它是无产阶级的科学宇宙观。只有阶级立场坚定，对无产阶级无限忠诚的革命者，才能真正掌握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的书讲出了千百万劳动人民要讲的话，毛主席的一言一语，都反映了无产阶级的

^①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版，第524页。



要求和愿望。只有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有深厚的阶级感情，才能对毛主席的书有深厚的阶级感情。只有破除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才能懂得活生生的革命辩证法，才能学好毛主席的著作。

阶级感情就是对劳动人民无比热爱，对阶级敌人极端仇恨。焦裕禄同志就是带着这种强烈的阶级感情去学习毛主席著作的。

焦裕禄同志所以能够抓住阶级斗争这条纲，能够从困难中看到希望，看到人对物的决定作用，看到政治对经济的决定作用，首先是由于他有坚定的阶级立场。

毛泽东同志说：“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①这就是说，必须在革命实践中去学习毛泽东思想。

仅仅在理论上记住阶级斗争，记住政治的统帅作用，记住困难的二重性，记住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原理，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不难的。毛主席著作学得过硬不过硬，决定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具体运用。焦裕禄同志学毛主席著作学得好，过得硬，好就好在他能具体运用，硬就硬在他能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他把毛泽东思想应用于领导兰考县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革命实践。他用毛泽东思想发动群众，制伏洪水，锁住风沙，“吃掉”盐碱。焦裕禄同志同兰考人民一起，在应用毛泽东思想去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实践过程中，学会毛泽东思想，解决了世界观问题。毛泽东思想同那些脱离实践的知识分子，同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懒汉，是没有缘分的。

焦裕禄同志的不朽事迹向我们指出，学习毛泽东思想首先要解决阶级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不是坐在书斋里玄思冥想可以解决的，只有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的实践中，用毛泽东思想指导自己的行动，才能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改造立场。这是焦裕禄同志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经验，这是广大工农兵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经验。

像焦裕禄同志那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每一个真正革命的人，都是可以做得到的。这是做不做的的问题，而不是能不能的问题。我们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处于世界新的伟大革命时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每一个有志气的革命干部，每一个真心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人，都应当下定决心，以焦裕禄同志为榜样，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我们可以想一想：当我们的县委书记，我们的下部，都像焦裕禄同志那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不图名，不图利，不怕苦，不怕死，领导着意气风发的六亿革命人民，英勇奋斗，还有什么敌人打不倒呢？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还有什么力量能阻挡我们前进呢？可以断言，无论帝国主义也好，修正主义也好，原子弹也好，统统奈何我们不得。任何狂风恶浪，任何牛鬼蛇神，都吓不倒我们。我们国家的颜色，一定能够子孙万代永远鲜红。我们的革命事业，一定能够永远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

^①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508页。



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编者按：本刊今年第二期刊登了《欢迎工农兵和学生投稿》的启事以后，广大工农兵和学生纷纷来信、来稿，表示热烈响应和支持。他们说：“工农兵动笔写文章，是毛泽东时代才有的事”；“看到《红旗》欢迎工农兵和学生投稿，受到很大鼓舞”；“中国共产党的刊物为我们而办，吸收我们参加，这是极大的光荣”。有的还说，“过去不敢写文章，认为那是理论家的事，现在也要拿起笔来了”。

对于这些文章，由于杂志篇幅的限制，只能选用一部分。其中，有的全文刊登，有的摘要刊登。《日常工作中的辩证法》这一组文章，就是摘要刊登的。

解放军某部侦察连的

哲学故事会

为了推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解放军某部侦察连的团支部和革委会根据大家的要求，举办了一个哲学故事会，交流大家怎样在平常事情里运用辩证法的体会。

故事会的主席是团支部书记张延吉。他说明了这个故事会的目的之后，问大家：谁打头炮？

会场上，气氛十分活跃，有人喊：“咱们连长故事多，数数足有十几箩。还是请连长先抛一个出来引个头吧！”

连长赵光欣在大家的热烈掌声中站起来，讲了个——

练“抓”和练“走”

以前，有人对咱们侦察兵夜间战术训练提过意见：光练“抓”（抓俘虏）不练“走”（接敌运动）不符合实战要求，得改。当时我想，得了，人家练了不少年，积累了不少经验，还轮得到我们来推翻吗？要改，人家不早改了？对前人传下来的经验，不可不信呀！因此，我还是照着葫芦画瓢，光练“抓”



不练“走”。

去年冬季野营前，上级要我们打破框框，改革训练方法。我想，既然群众早有要求，这回上级又有指示，那就干脆来它个彻底翻新，于是领着大家一个劲地练“走”，把练“抓”丢到一边去了。这一来，走倒比过去会走了，可是遇到“敌情”，却不知怎样靠上去“抓”了。

后来我才搞清楚，对练“抓”和练“走”都不能有片面认识，练“抓”和练“走”都不能丢。要在练“抓”中练走，在练“走”中练抓，才符合实战的要求。如果光练“抓”，抓敌人的本领是练到了，可是怎样靠近敌人，怎样甩开敌人，却没有学到手；如果光练“走”，靠近敌人、甩开敌人的本领学到了，可是怎样才能抓住敌人呢？不能从一个片面性走向另一个片面性。第一次片面，是我迷信别人的经验，墨守成规，结果束缚了自己的手脚；第二次片面，是我全然否定了别人的经验，瞎闯一气，结果走了弯路。看来，既要肯定别人的经验，又要发现其不足，不断用自己的实践经验大胆地更新它，丰富它，才能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训练是这样，其他事情也是这样。

连长一讲完，八班战士徐在鹏站起来说：“其他事情的确也是这样！”他接着就讲了一场由主观片面引起的——

查铺的风波

有天晚上下岗回来，身上冷飕飕的。我想，天这么冷，要是有谁被子没盖好，受了凉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我就到各排宿舍去

查铺。查到我们排的时候，我刚把电灯一开，上铺马上有几个人嚷起来：“是谁没事找事？”我好心来查铺，却挨了一下闷棍，恼火得一夜没有睡好。

后来我冷静一想，原来我忘了我们排的电灯线路跟别处不同。别处是一只开关管一只灯，拉开一只灯查铺不会影响大家睡觉；我们排呢，是一只开关管几只灯，一拉开关整个宿舍亮堂堂。那天晚上一定是电灯光把睡在上铺的几个同志弄醒了，难怪他们有意见。我虽然出于好心，干的好事，但方法不对，效果不好。

这样看来，一个人无论办什么事，动机不好，效果肯定不好；动机是好的，如果方法不对，效果也不一定好。有些时候，由于我们主观片面，对客观实际没有全面了解，脑子里想的和实际情况不符，也可能把好事办坏。这里，方法很重要。毛主席教导我们，解决工作中的不同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方法对了，效果才能好。这就要对事物进行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有了好的动机，采取好的方法，就能得到好的效果。

“报告！”随着喊声站起来的是五班粗壮结实的机枪副射手钱智培。他说：开头我不安心工作，后来，认识到局部和整体是怎样的关系，我才——

安心当副射手了

领导上调我当机枪副射手时，我觉得当正射手才有意思，当副射手给别人唱配角，跑龙套，总感到比别人矮那么一截。一背上弹盘，就打不起精神。有一次打靶，正射手



已卧倒做好了射击准备，等我递弹盘。可是我递过去的弹盘，竟连弹带头都没有抽出来，影响了射击。

指导员找我谈心，他指着桌子问我：“这是什么？”我说：“桌子呗。”他又问我：“要是把四条桌腿拆掉呢？”我回答说：“那还成什么桌子了？”指导员接着说：“是啊！桌子是由桌面和桌腿组成的，没有桌腿就不成个桌子，桌腿对桌子说来，是局部和全局的关系。桌子是这样，一挺机枪更是这样，两个射手，谁也离不了谁。要打好靶，没有副射手还行啊！”经指导员这么一讲，我才懂得了正副射手在射击中的关系。打起仗来，正副射手密切配合，机枪才能发挥火力。如果锣齐鼓不齐，怎么能歼灭敌人呢？从此，我就安心当副射手了，操练时和正射手密切配合，第二次实弹射击，打了个硬梆梆的优等。

接着发言的是七班战士奚国森。他第一练习打半身靶时，得了个优等，可是第二练习打全身靶时，却打了个五发一中。他说：这是因为没搞清——

“差不多”和“差得多”

打第二练习的时候，我以为自己的技术练得差不多了，第一练习打半身靶还打了个优等，这次打全身靶，真是三个指头捏田螺——十拿九稳啦。上了靶场，第一发打中了，心一乐，手一松，“乒乒”几枪，结果四发全飞掉，“差不多”变成了“差得多”。

“差不多”思想万万不能有。当你一觉得“差不多”的时候，实际上已原地踏步，不前进了。可是客观要求一天天提高，同志们

一天天进步，结果自己就越差越多了。事物是发展的，“差不多”随时可能转化为“差得多”。一个人只有永远感到自己“差得多”，不断努力，才有可能避免“差得多”。而当你感到“差不多”的时候，就会故步自封，不进则退，人进我退，又要陷入“差得多”的局面。在前进的道路上，只有永远感到自己“差得多”，才能勇往直前，登上顶峰，要不，就会从山坡上滚下来。

五好战士李思通几次站起来没有捞到机会讲，这次他没等主席点头就抢先说开了——

图轻快 倒不轻快

有一次，连里组织按地图行进，布置我们班两小时以内复杂地形上兜一个五公里的圆圈，寻找十个目标。接受任务以后，我打算组织大家在图上研究一番再出发。有的同志却说：五公里的圆圈在地图上就拇指大一块，在那上面花时间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不如早点出发早点回来。结果，就匆匆出发了。谁知一出门就走错了方向，等发现不对，再看地图，已经过了第一个目标四里多路了。回头再找到第一个目标，一个小时过去了。吃了哑巴亏，走了冤枉路，我赶紧重新领着大家研究地图，连路上每个转弯处有什么明显的方位物都记下来。后来的九个目标，只用了五十分钟时间就找到了，提前完成了任务。

看来，做准备工作固然要花一些时间，做好了却能缩短以后的时间；怕耽误时间，不做准备工作，匆匆忙忙，结果，回头重来，



反而浪费更多时间。这样看来，办一件事情真是：越不怕麻烦越不麻烦，难办的事变好办；越图轻快越不轻快，好办的事也变得难办。

六班战士吴祥根对于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会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深有体会。你听他讲——

为啥大江里的船会翻在小河里

我第一次参加横渡长江时，和大家一起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游泳训练的伟大号召，下决心闯过去，在精神上压倒了困难，下水前又做好了各方面的物质和技术准备，在水里越游越沉着，终于冲破一层层激浪，胜利地游到对岸。

横渡长江回来又在小河里泅渡，我想，大江都闯过来了，这小河还能“翻了船”！说来也怪，正因为精神上松懈，物质上技术上又马虎了事，结果偏偏过不去。在一次泅渡中，由于身体没有活动开，腿抽了筋，枪又没有背好，滑过来滑过去，老往头上压，连呼吸也受到了影响。游了不远，只好停下来。

“到了家门口，还得防摔跤”，这话很有道理。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利中往往包含着不利，不利中往往包含着有利，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有利和不利会互相转化。大江大河水面宽，风浪大，是不利因素；但是，由于我看到了这些不利因素，通过主观努力，能促使它向有利方面转化。小河流水面窄，风浪小，泅渡的条件很有利；但是，由于我思想麻痹，结果出现了很多不利因素，在小河流里“翻了船”。这件事使我认识到：不

管在有利条件或不利条件下，都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战略上藐视困难，战术上却一定要重视困难。

说到游泳训练，九班长刘兆和讲了一个对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的故事——

首先要看思想上的差别

游泳训练第一周，陈锡林在浅水里才能游十米米，陈继高已能到深水里游二百多米了。当时我想，他俩原先都是“称砣”，比个头、体力、领会程度，陈锡林那样也不差。所以，在游泳训练第二周便要求他赶上陈继高。谁知，一周以后，陈继高已游到七百米了，而陈锡林还是手脚动作配合不上。经过调查研究我才知道，陈继高每次训练总是争先恐后，陈锡林却见水就愁。陈继高进步快，是因为树立了一个“敢”字，陈锡林到现在却还没有打掉“怕”字。过去我光从表面看，认为他们条件差不多，而没有从思想上分析比较，找出差距，硬叫陈锡林到深水处去游，岂不成了“赶着鸭子上架”啦。以后我就给陈锡林讲学习游泳是为了消灭更多的敌人的道理，讲了毛主席横渡长江的故事，并向他讲明，人要在水里得到自由权，就要敢于实践。后来，陈锡林也很快跟上大家了。

这件事使我认识到，找差别不能只看表面现象，首先要看思想上的差别。如果只从表面看问题，否认内在的思想上的差异，就不能帮助后进赶上先进。

有人推了一下攀登能手金忠发，要他说说他从两次攀登中得出来的体会。金忠发站



起来说了——

胆大才能艺高

开始练攀登，到作业场一瞧，吓了一跳，直陡陡的山坡如何上得去？又怕上不去，又怕掉下来，心里像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不料，就在这当口上，班长又将了我一军，说我是老同志，要先开头炮。我只好硬着头皮往上攀，攀到山半腰，身体被一个石棱角挡住了，骑虎难下，我只好停在那里发呆。后来还是山上的同志用保险绳拉了我一把，才攀登上去的。

第二次攀登就不同了，我总结了第一次的经验，打掉了“怕”字，带着敌情观念，一走到作业场，牙齿就咬得格格响。我想，我家祖祖辈辈受地主剥削压迫，想想外祖父被地主吊起来毒打的悲惨情景，想想南越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的劳动人民过着同我们解放前一样的生活，仇恨就涌上心头。听得班长命令一下，我就登登地往上攀。我对自己说：上面就是毒打你外祖父的地主，上面就是杀害南越人民的刽子手！我浑身来劲，就这样爬上去了，抓到了“敌人”的哨兵。班长问我怎样爬上去的，我说：阶级仇恨给自己壮了胆！

从两次攀登中，我体会到：艺高胆不大，艺是空的，甚至会变成零。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才是胆子最大的人，才能使武艺得到充分的发挥，即使暂时艺不高，以后也一定会练出一身过硬的本领。

别人的成功经验固然要学，但是，给养员鲁宏智说——

失败的经验也要认真学

听说兄弟单位改进野外烧煤灶已经试验多次了，我们便抱着很大的兴趣去取经。可是第一次去，人家火没烧着；第二次去，又碰上煮了夹生饭。回来，大家议论开了。有的说：“人家还没有绝对把握呢，哪里有经可取？”我不由想起了上半年改蹄形回风灶的经过。那回我们失败了二十三次，由于大家认真吸取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教训，最后，终于取得了成功。要是没有二十三次的失败，哪会有第二十四次的成功！既然我们自己在改灶中能接受失败的教训，转败为胜，为什么不能把别人失败的教训当经来取呢？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带着行军锅、炉条，到兄弟单位挖的灶上，生火试验，边烧边研究，反复琢磨了几天，终于找到了兄弟单位烧成夹生饭的原因，在于灶膛内壁挖得太直，行军锅四周空隙太小，灶膛里回不了风，火转不开，只烧在一小块锅底上。我们就按过去改蹄形回风灶的经验，把灶膛挖成鼓形，终于把满满的一锅饭烧熟了。

失败和成功，是对立统一的，失败里就包含着成功的因素。我们无论干啥，都希望成功，不希望失败，但事实上要得到成功，常常免不了要受到一些挫折或失败。只要经得起失败，善于从失败里找出教训，并虚心吸取别人的经验教训，失败是可以转化为成功的。

像这样失败变成功的故事多得很。在格斗练习中，小个子怎样斗倒大力士？四班战士孔庆霖同陶顺银交手时有过经验，他站起



来回答道——

以己之长 攻人之短

陶顺银“五大三粗”，整整比我高一头。还没和他交手，我就心慌三分。一上场，他气势汹汹，我原先想好对付他的那几招全忘了。憋憋气我猛扑上去，陶顺银却不慌不忙地往边上一闪，趁势来了个“顺手牵羊”，把我摔了个嘴啃泥。我不服输，可输在哪里呢？我根据毛主席的教导，重新估量了双方的条件：陶顺银身粗力大，我个小灵活，这是双方不同的有利条件。他的长处是我的短处，我的长处也是他的短处。对付这样的强手，必须首先有勇气，解决“心慌三分”的问题，才能以己之长攻人之短，以己之智胜人之拙。于是第二次交手时，我就满怀信心，尽量避开我的短处，发挥我的长处，弄得他头上直冒汗，疲于应付，动作越打越乱套。我瞅准机会，趁他一个不注意，来了个击胸扫腿的配合动作，终于将他撂倒。

在敌我格斗中，勇敢是决定性的因素。不想斗，不敢斗，就谈不上斗倒对方；当然，如果有勇无谋，不讲究战术技术，碰到对方强过于你时，也谈不上斗倒对方。知己知彼，既有勇，又有谋，小个子就能斗倒大力士。

一个个故事，说明一条条哲学道理，大家越谈越开窍，争先恐后要发言。炊事班长顾发祥站起来说：我参加这种会头一回，好歹也说上一个——

口味为啥一下子变了

去年夏天，正当游泳训练十分紧张的时候，我们炊事班从生产地里收来了一大批洋葱。我想，这可是大家爱吃的菜呀，得好好给同志们改善改善生活。我召集全班郑重其事地研究了一番，接连几个中午的菜单上订了洋葱炒肉丝、洋葱炒鸡蛋……。炒菜时我亲自掌铲，还特地多放些调料。我满以为大家一定吃得很香，谁知第二天就有三个班剩菜了，第三天分菜时有的班干脆不要了。这真叫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究竟是为的啥，口味一下子变了？

后来连长叫我们炊事班参加全连武装泅渡。我下水游了八百多米，就觉得肚子里折腾起来，嗓子里也一个劲往外冒酸水，一股荤油葱味直冲脑门，呛得我气都喘不过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坚持到底。上岸以后，班里几个同志告诉我，吃了洋葱反起胃来特别难受。这时候我才知道了大家不喜欢吃洋葱的原因。陆地练兵和水里练兵不一个样，客观条件变了，同志们的生理反应变了，口味也变了，我还按老一套办事，怎么不碰钉子呢！

故事会已经开了两个钟头，大家的热情很高。指导员丁先明跟主席商量了一下，把会议结束了。

会散了，大家陆续走出会场，可是，不少同志还在兴致勃勃地谈论着。

（张延吉、刘玉峰、周可丰、

程明玖、杨泽民、陈云林整理）

续
②



实 践 出 智 慧

武汉部队后勤部营房部助理员 宋 乐 山

一九五五年，领导上分配我到武汉部队后勤部门做营房工作，主要负责营具的制作、采购和分发。十年来，我跑了南北九个省的许多地方，采购营具二十多万件，木材几千立方米，经手几百万元，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和大的差错。同志们说我工作做得有成绩，问我有什么经验。我想来想去，如果说我取得了一点成绩和经验的话，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切实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

学习《为人民服务》，热爱营房工作

我原来是做警卫工作的，文化程度很低，没有做过机关工作，对营房工作更不熟悉。初来时，看见营房的图纸蓝底白道道，弄得头昏脑胀也看不懂，营具统计表上的几十种品名，好多也识别不了，心里非常苦恼。我想，这工作我干不了，每天和桌椅板凳打交道有什么意思？不如趁早回部队。后勤部的首长对我说：“干革命可要服从分配呀！不能挑挑拣拣的。要是都回部队，这后勤工作谁来搞？”“什么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不怕不会，就怕不钻。你想想，参军前你会啥？还不是在党的培养下才有了进步的吗？”

这时，我学习了《为人民服务》。毛主席

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张思德原来也是做警卫工作的，党叫他烧炭他就愉快地去烧炭，为了人民的革命事业，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现在党叫我搞营房工作，这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我为什么要三心二意呢？想来想去，终于想通了，懂得了我们不论做什么事，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为了把自己锻炼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用人才；懂得了做好营房营具的管理工作，不仅可以体现党对部队的关怀，也可以节约经费，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因此，我就安心这个工作了。后来，每当我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思想有波动的时候，又反复学习《为人民服务》，就更加热爱这项工作了。

勇于实践，变外行为内行

有了做好工作的决心，不等于就是做好工作了。要想把工作做好，还必须勇于实践，在实践中才能前进。

我到营房部工作不久，就同另外一个同志到郑州去接收一批正在加工的营具。当时，我什么也不懂，人家说啥我听啥，坐在那里像木橛子似的。我心里非常着急。怎样能学会工作呢？我学习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



问题》。毛主席说：“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①毛主席这段话对我启发很大。我过去根本不会打枪、刺杀和投弹，还不是在实践中学习的吗！过去我一字不识，现在有了点文化，不也是在实践中学习的吗！现在，我对营房工作，虽然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但路是人走出来的，工作是人做出来的，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勇于实践，善于学习，工作是一定可以做好的。于是，我就下定决心，在实际工作中边干边学。

一九五六年，领导上派我到河南新乡制作营具。这是我第一次单独外出执行任务，要开支一百多万块钱，制作十多万件营具。这可是一件大事。我心里真像揣着个小兔似的，蹦蹦直跳。制作营具的知识我一点也不懂。怎么办呢？还是请教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说：“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②这段话对我真起了立竿见影的作用。我想，工人们都是内行，都是老师，在这么多内行和老师面前我还怕什么？于是，我就从旅社搬到木业社，积极参加劳动，和工人打成一片。他们干活时，我就用心看他们如何操作，他们休息时，我就去虚心求教。

开始，有的人嫌我麻烦，说我缺心眼儿。他们说：“你住旅馆多舒服，抽时间来检查检

查，到时候运走不就行了吗？何必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放着清闲不清闲。”但是，我认为，图清闲就不能学到知识，学知识就不能怕麻烦。现在麻烦点，以后工作就顺利了。我坚持边干边学，和工人一起锯木料，刨木板，钉钉子，并在生活上关心工人，同工人们搞得很热火，很密切。这样，在工人帮助下，我学会了看图纸，懂得了做一副营具需要多少工时，多少钉子，多少油漆，多少附料，还初步学了电锯、电刨、打眼机、开榫机等的操作方法。取得了这些知识，就便于我计算营具成本和检查营具质量，使我比较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一九六一年，我到湖北恩施去调运木材，这对我又是一个新的课题。对木材如何识别，如何检尺，如何扎排，我又是一窍不通。不会识别，就分不出木材的好坏；不懂检尺，就像小孩不识数一样，人家说多少就是多少；木排扎不好，遇到大风浪就会被打散。当时，时间紧，任务重，心里有些急躁，恨不得一下子把不懂的东西全学会。我向木材转运站借了一本《木材材积累计方法》来学习，但看了半天仍然不懂。怎么办呢？我想，要学会检尺、扎排的方法，还是必须亲自参加实践。

于是，我就到工人当中去学习。开始，自己不讲究方式，又着腰问他们：“同志，检尺是咋搞的？”他们说：“检尺吗？上边知道，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74页。

^②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85页。



你去问上边吧!”我又问:“同志,哪种木材好?”他们说:“都好!”我感到不大对劲。工人们为什么会这样回答我呢?毛主席说,要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而我到这里没有参加劳动,没有同工人打成一片,就急急忙忙地问长问短,工人同志怎么会欢迎我呢?想到这一点,我就上山和工人一起扛木头,放木头,量木料,在河边和工人一起扎木排,给工人送水,忙时顾不上吃饭,就买柿子充饥。有时整天泡在水里,手脚都泡白了。还有一次掉在水里,把腰扭了,爬起来再干。工人们看到我一片真心向他们学习,就主动来帮助我,教我识别木材和检尺、扎排的方法。他们说,杉木、杂木由外往里烂,易识别;松圆木由里往外烂,不易识别。颜色发黑,两头冒白浆,并呈筛状,就是烂木材。用锤子敲一敲,声音发闷,也是坏木材。检尺时,条木直径量中间,圆木直径量小头。扎排时,头排腰箍要扎牢,底排要用杉条扎,因为杉木直,浮力大。工人们对我的帮助,使我深刻地认识到,群众是真正的老师,在群众面前,只要认真放下架子,甘当小学生,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什么知识都可以学到手。

我在采购中还经常碰到运输方面的问题。开始,不了解运输规律,碰了不少钉子。一九六二年,我到黑龙江宝泉岭去运铺板,在机关里闭门造车,编造火车运输计划,要了两个敞车。谁知这种车皮容量小,装上铺板,还需要插木桩,盘铁丝,盖雨布。用这种车皮显然不合适。在调拨汽车时,运输站

的同志总问我要什么型号,多大吨位,多少辆,我又答不上来。

以后,我就在鹤岗、萝北、宝泉岭等地认真地进行了调查研究。我带着小本到火车站去登记每一种车皮的容量和吨位,并根据铺板的规格和车皮的容量,计划铺板的装法。我调查了五种车皮,经过分析比较,选定了两种装铺板最合适的车皮。我还调查了车站的一些规章制度,如什么时候申请车皮,什么时候装货等等。

用哪种汽车装运铺板好呢?我又到汽车站去了解情况,就是在街上也不放过调查机会。有一次,我在街上看到一辆大斗车。我想,这车这么大,一定装得多,便取得司机同意,到车上量了又量,比了又比。我自言自语地说:“这车最合适!”司机奇怪地问:“什么最合适?”我说:“装铺板最合适!”司机笑着说:“这家伙准是个汽车迷!”我心想,要说迷,就是迷,不迷就学不到东西,就不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我还进一步摸索航运方面的知识和规律。一九六四年十月,我到江西南昌去运铺板。用火车运还是用船运合算呢?有人说火车运好,也有人说船运好,需要我下决心。我记起了毛主席的话:“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①我考虑到“侦察”二字,自己没有侦

^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3页。



察，怎么能下定正确的决心呢？我就沿着赣江，见船就问。有的船正忙着，不能上船。一直走了十多里，才见到一条大船。船老大同意我上船调查，我高兴极了，一口气跑上码头，借来尺子，仔细地量了船舱。经过计算，说明船运比火车运便宜，我下了船运的决心。

要想把工作做好，必须热爱自己的工作。过去，我到一个新的地方，常常爱看看电影，逛逛公园。现在，我是先进木器铺，看看各式各样的家具，有合适的就记下来准备采用。看得多了，哪里什么东西好，哪里贵，哪里便宜，心里都有底儿。别人购买的营具，质量好坏，单价高低，也能够看得出来。例如，一九六四年，我们单位在汉口加工一批铺板，原来计算每副加工费五元三角，我一看，觉得太高，就和加工厂核算，并进行现场试验，每副降低到二元六角。同年九月，湖北白沙洲贮木场拨给我们七百立方米松圆木，在检尺过程中，我发现百分之八十都坏了，同场长、检尺组长商量并进行现场试验后，他们作了调换，已运出的降价处理。

这几年来，我在工作中深刻地认识到，我们共产党人，要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深入社会实践，也就是说，要放下干部架子，走出办公室，作调查研究，虚心向群众学习。

依靠群众，克服困难

几年来，我经常一个人远离领导出差办

事，常常遇到许多这样那样的困难。每逢遇到困难，我就学毛主席著作，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结果把困难一个个地都克服了。我深深认识到，千难万难，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就不难，依靠群众就不难。

一九六四年四月，我在黑龙江省萝北县订购了五千副铺板和一万条铺凳，按合同规定，在六月底和七月底分两批运货。六月初，我又到了萝北，检查合同执行情况，并造了四个火车皮的调拨计划，准备把第一批铺板、铺凳运回来。可是，一到萝北，心就凉了，许多矛盾摆在我的面前：第一，已经做的铺板、铺凳，有一部分不合质量要求；第二，加工速度缓慢；第三，当时正处于农忙季节，装车劳动力不足；第四，自己一个人要担负三个加工单位的验收和组织运输的工作，照顾不过来。面对着这许多矛盾，我真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

怎么办呢？晚上，我一边学习《矛盾论》，一边思考。毛主席说，捉住了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我就把这些矛盾一个个加以分析，看哪一个主要的矛盾。想来想去，我认识到，铺板是靠工人来做的，做得好与坏，工效能不能提高，全在工人，因此，还是人的因素第一，只要发挥了工人群众的积极性，这些矛盾都可以解决。但是，我又不是这个单位的领导，怎样去进行思想发动，把群众的积极性发挥出来呢？我就找场的领导，谈了我关于发动群众的想法，他们很赞成。同时，我又学习了《关心群众生活，



注意工作方法》这篇文章，认识到要发动群众，必须从同群众生活在一起，关心群众的痛痒，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入手。于是，我就决心到贮木场，参加车间劳动，和工人打成一片，并帮助工人和家属做事。

第二天天刚亮，我就起了床，拿着扫把把贮木场办公室周围和家属住区打扫得干干净净。吃完早饭，我又到电锯车间劳动。中午休息时，我借了一把锄头，帮助他们锄地。见到哪家水缸没有水了，我就给他挑得满满的。吃饭时，我帮助炊事员刷碗擦桌。这样干了几天，工人和家属们见到我就亲热起来了。每次劳动一休息，有许多工人围着

我，要我讲革命故事，唱革命歌曲。我想，工人们主动亲近我，正是我进行思想发动的好机会。我说，我的嗓门不好，唱起歌来不好听，还是给大家读读毛主席著作吧！工人们听说读毛主席著作，更加高兴。我就给他们读了《为人民服务》和有关勤俭建国、自力更生的论述，并联系铺板的生产任务，说明提高质量，就能延长使用年限，减少国防开支，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也就是具体地为为人民服务。

开始，有个别工人还认为铺板质量差点没什么。我对他们说：“你们住在东北，不知道南方的特点，天气热了，只铺一条床单，甚



宋乐山同志在载运铺板的船上，给工人讲《愚公移山》和王杰同志的事迹，鼓励工人战胜困难。

武 军 摄



至有的战士就睡在铺板上，如果不刨光，战士睡着就会磨得慌，床单也容易磨坏。”我还说：“你们把铺板做得好一些，就是以实际行动支援了部队。战士们睡得舒服，练兵、打仗都有劲，他们就会感谢工人老大哥对他们的支持。”我还问：“你们有没有亲人在部队上？”他们说：“有！”我说：“要叫他们都睡在铺板上行不行？”工人们一听都笑了，说我讲得有道理，主动提出返工。有的还说：“老宋，你说咋办就咋办，一定保证质量。”

接着，场里召开了动员大会，开展比学赶帮的生产竞赛，提出了保证铺板质量，支援部队的号召。这时，我进一步深入车间劳动。工人们修整铺板时，我就给他们背铺板、送水。当时，我的胃病发了，疼得十分厉害，但仍然坚持同工人一起干活，一起吃饭。为了使工人们更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我到书店买了十几本毛主席著作单行本，送给工人学习。工人们学了毛主席著作，干劲越来越足。为了保证质量，工人们自动组织了质量检查小组，检查每一块铺板是否符合质量要求。经过工人们的努力，铺板做得又好又快。

这时，离铺板装运的日期只有七、八天了。加工地点离鹤岗车站有一百公里，如何在计划的日期内把铺板运到车站，又是一个问题。按活计算，每天需要二十多个劳动力负责装卸，才能如期运到。但当时正值农忙季节，组织劳动力有困难。我想到动员工人家属装卸是一个办法，便把这个想法同场领导商量，取得了他们的同意。我还没有到工

人家属中去说这件事，她们却主动地找来了。她们说：“老宋，咱们早就看透你的心思了，你不说，咱们也得来帮忙。”有的还说：“你起早贪黑为咱们担水、扫地、种菜，处处关心咱们，咱们也得为解放军做点好事。”头一天就来了二十多人，有的连饭也顾不上吃，加紧装卸，工作进行很快。

在运送铺板时，又赶上下雨，路上泥泞，有的司机不大愿意拉，也不愿多装。我就给他们讲拉营具的重大意义，讲朝鲜战争中志愿军英雄司机的故事，鼓励他们向困难作斗争。有一次，汽车陷在泥泞里，司机说：“算了吧，把铺板卸了。”还有的说：“把拖车放在这里，以后再拖。”我一面动员他们，一面跳到泥里，挖泥推车。终于在工人同志的帮助下，把车子从泥泞中拉了出来。

这样，经过工人、家属和司机的共同努力，第一批铺板按原计划提前三天发走了。

第一批铺板运走后，必须加速赶制第二批铺板和铺凳。我又到了贮木场。当时该场铺板生产中的主要问题是火锯车间的速度跟不上。我到火锯车间，和工人们一起劳动，一起挖潜力，终于由一天拉十六立方米原木提高到二十二立方米。木工车间为了提高产量，也想了许多办法。全场工人干劲倍增，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在萝北的这一段工作，给了我很大的教育。毛主席说：“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



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①对这一段话，我有了更深的体会。

精打细算，为社会主义 节约每一厘钱

我们做采购工作的，经常经手的是钱和物，稍不注意，就会为国家造成浪费。怎样才能做到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呢？我没有别的门道，就是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节约的论述，树立勤俭建军的思想。毛主席说：“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②后勤干部是部队的管家人，要把这个家管好，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真正做到勤俭节约。

我每次购买营具的时候，都要精心算一算，看花的每一厘钱是不是用到正地方，对社会主义建设是不是有利。

一九六四年，我在萝北名山贮木场装运铺板。铺板打捆可以用草绳，也可以用铁丝，但到底哪个省钱呢？我就跑到五金商店和货栈去打听。我对草绳和铁丝比了又比，算了又算，最后算出用十八号铁丝打捆，每捆只花五分钱，而且铁丝细，装车不占地方，解装后还可以再用。用草绳打捆，每捆要合五分五厘。这样，就采用了十八号铁丝。还有一次，在汉口加工一批三斗桌，厂里计算价格时说一张桌要用二两钉子。我找来了一张三斗桌数了一下到底用了多少钉子，又称来二两钉子数一数，实际证明二两钉子可以钉两张半桌子。平时，我走到哪里，只要看

见地上有一颗钉子，有一根能用的小木头，都把它拾起来，准备以后再用。

节约国家财产，必须经常动脑筋，想办法，反复试验，反复实践，因为处处都有节约潜力。一九六四年，我在吉安运铺板，当时铺板存放在三个仓库里，距离码头一千三百米。是用汽车搬运还是用板车搬运省钱？我找了一辆汽车和一辆板车来作试验。试验证明，汽车运因为要另外组织劳动力装卸，一块铺板的运费要九分五厘，而板车运不需要另外组织劳动力，一块铺板的运费只合五分七厘，比汽车运节约三分八厘。我就采用了板车运的办法。

几年来，我们用汽车和火车运输铺板，装载量不断有所提高，这也是从实践中反复摸索出来的。最初，一辆解放牌汽车装一百零四块铺板就满了。我想，一辆汽车的载重量是四吨，而一百零四块铺板只两吨多一点，这样装不能充分发挥汽车的运输能力。我就和工人们多次商量试装。开始试装时，只装了一百零三块，不但没有多装，反而少装了一块。有人对我说：“你不要多费脑筋了，反正公家报销，又用不着你拿钱。”我说：“我们要为国家负责，多节省一辆车，就为国家多增添一分运输力量。”在工人同志的热情协助下，我坚持进行试验，一九六三年每辆解放牌汽车就提高到能装一百四十块，一九六四

①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97页。

② 《我们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9页。



年又提高到能装一百七十六块。火车装运也是同样的情况，开始一个车皮只能装七百块，以后不断研究，把一切空隙都利用起来，最多能装到八百三十五块。

要厉行节约，真正做到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就得有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这些年，我为了购买到价格便宜、质量又好的营具，到处去调查货源、货价，跑了不少的路，爬了不少的山，经常饿肚子，有时宿野外。虽然苦，虽然累，但我心情非常舒坦，因为能为社会主义建设节约，自己再辛苦再劳累也值得。有一次，我在湖北麻城订购铺板，了解到龟山的铺板价格便宜，质量又好，就决定到龟山去。不巧，那时连下两天大雨，麻城到龟山不通车。我学习了毛主席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的指示，决定冒雨去龟山。这段山路确实不好走，累得我浑身是汗。到龟山后，午饭也没顾得吃，就联系买铺板的事，当天又返回麻城。这天，我走了八十多里，脚上打起了一个一个的血泡，虽然很累，但想到自己按照毛主席教导，克服了困难，订购到合适的铺板，心里却甜滋滋的。

我们做采购工作的，必须树立国家的观点、全局的观点。一九六五年一月，我在南昌装运铺板，航运局拨给我五条一百吨的木船。当时正值春节前夕，城乡运输非常繁忙，我想，能不能腾出一条船来解决地方运输的困难呢？我就到船上去量船舱大小，船的高度，再按铺板的规格进行详细计算。计算结果，只要四条船就可以装完。装船时，我同

工人一起扛，一起装，一块压一块，一道缝也不留。最后，确实只用四条船就把铺板运了回来。按包运规定，少用一条船，运费并不减少，但却为航运部门节约了吨位成本费六百多元，为国家节约了一条百吨船的运输力，支援了春节物资的运输。

在工作中，凡是对于国家、集体不利的事，我坚决不做，哪怕是很小的事情也不马虎，绝不贪图小利。在南昌装运铺板时，南昌土产公司营业部多给我运了一副，我立即跑去告诉他们，并按价买了下来。多运一副铺板，放行证也得改，不然就要违反航运规则，我又到航运局重换放行证。咱们搞采购工作的人，就是要从这些小事中养成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模范地遵守国家法令的观念。

尽力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

我们革命工作者，为人民服务是无止境的。只要有会，就应当以最大的努力去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

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一开始我不是那样自觉的，在没有人的角落里做，在人多的地方不好意思做。在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运动以后，我对照自己作了检查，并带着这个问题学了毛主席的有关论述。毛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①我是一个

^① 《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61页。

●
王



共产党员，我的工作使我同人民群众接触多，就应当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多为人民群众做些好事。

一九六四年四月，我乘火车去萝北。一路上，我除学习毛主席著作外，就帮助乘务员倒水、擦车、刷厕所。经过信阳时，遇到寒流，我看见列车长衣服穿得很少，每到一站，他还冒着六、七级北风，下车接送旅客。我就把自己的棉衣脱下来，披在他的身上。开始，他怎么也不肯穿。我说：“你每到一站都要下车，我在车厢里问题不大。”看到列车长穿上我的棉衣走了，我心里暖和和的。

这次乘车快到鹤岗时，我在列车上看见一个妇女，带了两个孩子和五十多斤重的东西。一个孩子正出麻疹，发高烧，另一个也在生病。这个妇女在车上很发愁。我问她：“家住哪里？”她说：“鹤岗市东山矿新二街。”鹤岗车站离她家还有七、八里，两个孩子又病得厉害，怎么办呢？我立即对她说：“你放心好了，我保证把你们送回家。”车到鹤岗后，我把她们安放在一个背风的地方，就到转运站借来一辆手推车。那个妇女把孩子放到车上，自己怎么也不肯坐，怕我推车累着。我说，抢时间治病要紧，都坐上可以走得快些，为了孩子我累点没啥。这样，她才坐上去。四月的东北，冰还未完全解冻，我怕孩子冻着，脱下棉衣给孩子盖上。路途中，这位妇女在车上不停地说：“解放军真是处处为老百姓”，“你们真是毛主席教导出来的好战士”。到家以后，她的丈夫，老工人孙相恕激动得两眼含着热泪，双手拉住我，说我比

他的亲兄弟还亲。这位妇女又把已经睡熟的大儿子叫起来，要他给我敬礼，叫解放军叔叔好，说长大要当解放军。两夫妇看见天晚了，还硬要拉我住在他家。我说：“不要管我，我做这点事是完全应该的，快点去给孩子看病要紧。”以后，孙相恕夫妇还写信来感谢我，说他们两个孩子的病都好了。

几年来，我从南到北跑了好几个省区，凡是有能帮助群众做些好事的机会，我都不放过。在火车上，我为乘客端饭、送水；在旅社里，我利用早晚时间扫地、倒痰盂；在食堂里，我帮助炊事员洗碗、抹桌；上公共厕所，发现脏了我就打扫；到商店买东西，别人装车卸货，我就去参加；上理发店理发，看见等候的人多，我就帮助作卫生工作，等等。我扫过福建厦门的街道，扫过江西南昌、吉安的旅社和街道，扫过湖南津市的招待所，也扫过佳木斯、哈尔滨等车站的候车室。黑龙江萝北县的一些大街小巷，工人家属住宅区，我也打扫过。

扫地，表面上看来是一件小事，但是，这样一·扫，我同群众的关系就亲近热火起来了。在萝北，衣服脏了，服务员同志偷偷给我洗；下雨了，服务员同志就托人把雨衣给我捎到工作的地方；天冷了，群众见我在井边打水洗脸，就给我端来热水；我睡在桌子上，新婚的工人就将他的被子拿来，硬要我盖；我病了，工人家属们就擀面条，包饺子，硬要我吃；工作有了困难，群众就挺身而出帮助我。我每到群众家中，他们就向我问寒问暖，烧茶端水；走到街上，也有好些



人同我拉呱问好；在招待所里，经常有一些当地的干部、工人、学生来找我；有时扫大街，身后不知不觉就跟上一群小孩，他们边扫边说：“向解放军叔叔学习！”

特别使我难忘的有这样两件事。在萝北名山，我买了一百斤铁丝，要扛到五里外的贮木场去。我扛了一里多路，累得满头大汗。这时，碰见一个不相识的工人，他见我费力，就对我说：“老宋，我的车子在前边，顺便给你捎去。”我正想问他怎么认识我，他就把铁丝扛走了。我到贮木场刚坐下，他也把铁丝送到了。原来他根本没有车子在那里，而是他自己替我扛来的。另一次，我因为工作忙，夜里十一点多才回到萝北招待所。我一进门，服务员同志就问：“宋同志，你吃饭没有？”当天我没有来得及吃晚饭，但我怕给服务员添麻烦，就说：“吃过了。”过了不久，服务员同志就拿着几个馒头送来。三更半夜，炊事员都睡了，哪来的馒头呢？第二天才知道，是服务员同志摸黑进食堂拿来的。

干一辈子革命，学一辈子

毛主席著作

几年来，我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过程中，深刻地体会到，要真正学好毛主席著作，必须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和高度的革命自觉性，必须把学和用紧密地结合起来，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我出生在一个贫农的家庭。父亲在旧社会受尽欺压和剥削，后来被日本鬼子活活打

死。六岁的弟弟生病无钱医治而死。我从小就跟着母亲要饭，十岁就给地主放猪。幼年时，我不知挨了多少打和骂，受了多少冻和饿。这种悲惨的生活，直到一九四五年家乡解放时才结束，从此，我尝到了新社会的甜。

一九四七年，我参加了解放军。在党的教育下，我不断提高了阶级觉悟，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知道了所有穷苦的人，能得到翻身解放，当家作主，都是共产党、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懂得了我们穷苦人，只有永远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才能得到彻底解放。因此，我从心眼里热爱共产党和毛主席。以后，我就开始读一些毛主席的书，从毛主席著作中找革命道理。一九六〇年，军委扩大会议发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的号召，我就更加注意结合自己的思想、工作，学习毛主席著作。

毛主席著作给了我力量，使我的思想、工作出现了新的面貌。我愈学愈想学，一天不学就不舒服，就睡不好觉。对毛主席著作有了阶级感情，有了学习的自觉性，学习的时间等问题，也就能解决了。我在学习中做到了出差和在机关一样学，学习环境差和环境好一样学，工作忙时和不太忙时一样学。要把学习放在忙字之中，决不放在忙字之外。忙，更需要毛泽东思想作指导，不然就会忙得不对头，或者出毛病。自己给自己立规矩，找压力，任务、环境千变万变，天天读毛主席的书始终不变。



我学毛主席著作，常常是一边学一边思考工作中的问题，琢磨着怎样用毛主席思想去解决这些问题。想通了，我就放下书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又想想自己的工作哪些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哪些不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工作做对了，我又请教毛主席著作，研究一下为什么做对了；工作做得不对，我也请教毛主席著作，寻找为什么做得不对的答案。经过这样反复学习，把好的思想和工作方法积累起来，继续巩固提高；不好的，就吸取教训，避免再犯。

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目的，全在于运用。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解决“矢”和“的”的关系问题。要有目的地去学，有目的地去用。几年来，我在工作遇到困难时，就学《愚公移山》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论述；工作中矛盾多，问题多，需要深入实际去解决时，就学《实践论》、《矛盾论》以及有关调查研究的论述；要同群众接触了，就学《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为人民服务》；受到表扬，就学“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论述；受到批评，就学有关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论述；觉察到自己思想有不好的苗头时，就以毛主席的有关的话来对照检查自

己，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中。

我深刻体会到，学习毛主席著作，对于个人思想来说，是一个兴无灭资的过程，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有了缺点，不学习毛主席著作，改正不了；有了成绩，不学习毛主席著作，巩固不了。

我认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军人，不但有自己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任务，而且有向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任务。我在萝北贮木场、木材厂、招待所，南昌胜利路旅社、吉安站前饭店等地方，都参加了工人同志的学习，并帮助他们做一些组织和辅导的工作。南昌胜利路旅社有一个服务员，原来不安心工作，我就帮助她学习毛主席著作，后来听说她工作做得很好，还列席过南昌五好企业、六好职工代表会议。在旅途中，乘务员同志常常组织旅客们开展一些文化娱乐活动，我也趁这个机会讲毛主席语录。

我学习毛主席著作仅仅是刚入了一点门。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也还存在许多缺点。今后，我决心遵照林彪同志的指示，干一辈子革命，学一辈子毛主席著作，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



日 常 工 作 中 的 辩 证 法

烧火的学问

开封专署教师进修班勤杂工 王培建

去年我高中毕业，到开封专署教师进修班做勤杂工，担任烧火工作。刚去熟悉工作时，我看见老工人把煤向火里一撒，火焰带着呼啸声就着起来。我一看很简单，就满口承担下来。尽管领导对我说“如果有困难，可先学习学习”，但我毫不在意。

第二天，我便上班了。真是看起来简单，做起来缠手。有时需要大火，我偏烧不起来；有时需要小火，它偏猛烈地燃烧起来。弄得我措手不及。结果是烧糊了一锅汤，馍蒸了四十多分钟还未熟，最后还是老工人帮了我的忙。头一天就这样难堪地过去了。以后几天日子更不好过，每天早上我烧的那两个火，不是这个灭了，便是那个灭了，有时两个竟一起灭了，弄得我整天提心吊胆。这时又听到一首“赞美”我的诗：“高中生，比沙松，干啥啥不中，烧火烧不着，就是条文背的清。”这一来，更加使我垂头丧气，精神不振，好

几次都想不干了。

好在领导上下了一场及时雨，给我指出了病根，并希望我加强学习毛主席著作。我带着为什么搞不好烧火工作的问题，重学了《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文章。通过学习，我认识到搞不好的原因，首先是没有把烧火与干革命联系起来，分配烧火就烧火，没有想到烧好火做好饭，让进修班教师吃得好，保证更好地学习，将来毕业后出色地完成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任务。没有认识到烧火也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就没有树立起克服一切困难，搞好这项工作的决心，只是带着五分钟的热度去搞，碰到困难就灰心丧气，认为不是干这工作的材料，这怎能搞好工作呢？其次，有了正确的思想，还需要掌握烧火这项工作的规律，才能烧好火。学习以后，认识提高了，我鼓起了干劲。

从此，我就细心观察，并向老工人学习。经过一段努力，终于掌握了烧火的规律。我的经验是：烧火要与菜面案联系，需要大火时，应用少量多次的方法添煤，为小火准备条件；烧小火时勤添煤，不教它完全燃烧，等要大火时，用通条一捅，就会猛烈燃烧起来；晚上封火前先把煤渣掏出来，封时把煤均匀盖上一层，把火下面的水池填满水防止



漏气，第二天早上就不会灭了。

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火烧得大小都能掌握了，我又发现我管的两个火中，有一个添进煤后，忽的一下就有很多煤被吹出来，不但浪费煤，而且烧不旺。我很奇怪，为什么用同样的煤加同样的水，在一个煤火里燃烧得很好，而在另一个煤火里却不行呢？我就天天细心观察，可是很长时间还没有解决，使我很着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又一次学习了《反对本本主义》。毛主席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①这对我启发很大。前一段观察只在表面上打转转，没有深入事物内部，没有调查其历史。后来我就向老工人请教，才知道那个有很多煤被吹出来的煤火的鼓风机功率大，吹出的风“毒”，建灶时火肚子又浅。病根找到了，我向煤中多加了一些水，使煤粘在一起成为较大的颗粒，添煤时量多些，均匀些，这样煤就吹不出来了。

煤的性能不同，烧法也要不同。我们伙房旁边有一大堆煤，一到下雨到处流的是黑水，结果浪费了煤，又不卫生。有一次问事务长：“伙房旁那一堆煤为什么不烧？”他说：这是“李封”煤，烧起来很费劲，不好着，还易结成大块，掏火很不容易，不如烟煤烧起来省劲，着得旺，因此从前都不喜欢烧这种煤。我想研究一下怎样把这煤利用起

来，找了一个老年人问了问，才知道“李封”煤爆发性不好，但耐燃性很好，烟煤爆发性好，耐力却差些。知道它们的性能后，我就试验把它们掺在一起用，效果很好。这样，也为国家节约了一笔财富。

我在中学时学过一些辩证法，由于没有应用于实践，结果只会背点概念。现在把它用于实践有些效果，尝到了甜头，更增强了学习的劲头。但这只是初步应用，还差得很远，我今后要继续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在工作上做出更大的成绩。

“行”和“不行”

解放军某部一连文书 黄玉明

我们干工作，常常有个“行”和“不行”的问题。

记得，我刚从班调到连部当文书，感到样样事情都很生疏，加上连部工作要求高，自己文化水平低，就产生了一种想法：“不行，我干不了这文书工作！”开始时，领导叫我写一份材料，我把劲全使出来，费了很大力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上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版，第27—28页。



气，结果还是出了个“废品”。当时，我心里难过极了，头发胀，脸发红，晚上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觉得搞文书工作实在不行。这时，连首长及时对我进行了鼓励和教育，用毛主席的话开导我，使我懂得了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做工作，不能等学会了再干，而是要在干的当中去学。这样，我的脑子一下开了窍，心里也亮堂了。以后，我就按照毛主席的话，鼓起勇气干。

在工作中，我时时向同志们学习，向老文书同志请教，怎样写报告，写材料，怎样保管和登记文件；到别的连里去取经，听他们讲工作经验，观察他们怎样做调查研究，怎样从大量的材料中抓观点；自己写材料，写报告时，事先请教他们，写好后请他们修改，然后再比较自己怎样写的，人家怎样改的，对在哪里，错在哪里。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工作不像刚开始那样没头没脑了，慢慢地进入下文书“行”的境地。

这时候，我想：现在基本上掌握了文书工作的规律，摸索了一些工作方法，同现在刚当上文书的新手比，我也算是个老手了。由于产生了自满情绪，结果又碰了一些钉子，给工作带来了不好的影响。为什么会这样？我带着这个问题，学了一分为二的观点，对自己作了分析，才懂得，当工作有了进步，觉得“行”了的时候，还应该看到自己“不行”的地方。用低标准衡量，算是“行”了，要按高标准要求，就“不行”了；跟新手比

“行”了，跟老手比就“不行”了；做经历过的工作“行”了，做没经历过的事情，可能又“不行”了。开始由于我没有一分为二地看待“行”和“不行”，满足于有点“行”了，原地踏步不前，结果“行”又转化为“不行”了。

这件事使我认识到，文书工作是这样，干其他工作也是这样。当你刚刚接触它，还不入路，觉得“不行”的时候，就要有革命的勇气，有革命的胆量，在实践中学习锻炼，掌握事物的规律性，力争从“不行”转化为“行”。在“行”了的时候，又要全面看待自己，认识到还有“不行”的地方，防止停滞不前，转化为“不行”。总之，只有一分为二地认识问题，积极工作，才能不自馁，不自满，少走弯路，不断前进，我们的工作就越干越“自由”，越干越有成效。

“单枪匹马”和“一马当先”

武昌水果湖中学高二班学生 姜大洪

过去，我在工作中曾犯过“单枪匹马”的毛病。那时候，班上要出黑板报，学校要写标语、画刊头和漫画，我就一个人全部或大部包下来，绞尽脑汁，埋头苦干。可是效果并不好。同学们说我出的黑板报老是那些旧



框框，画的刊头老是一个人头、几个字。不生动，不活泼，没有几个人看。自己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宣传工作却搞得不好。问题在哪里呢？

我到毛主席著作里去寻求答案。毛主席一而再、再而三地指示我们：遇事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否则就会一事无成。毛主席说：“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①“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②。毛主席的这些话，好像是直接对我说的，简直说到我的心坎上去了。我不正是在做宣传工作中个人“空忙”一阵而效果不好吗？不正是个人逞英雄而实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吗？毛主席的话告诉我们，做工作必须发动群众。因为智慧从群众中来，力量从群众中来。

但是，我也遇到这样的学生干部，他没有“单枪匹马”，上面布置下工作来，他就命令主义地全部分配到下面去。而后自己就东瞧瞧，西望望，或则袖手旁观，或则指手划脚，等待着工作任务的完成。这样做的结果，任务也完成不好，并且还越来越脱离群众了。问题又在哪里呢？

还是请教毛主席的著作。毛主席说：共产党员的“积极性，应使之具体地表现于各方面，即应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③。这就是说，我们做任何工作，都要和广大群众结合成一体，和他们一起战斗，和他们同甘苦，带领他们去冲锋陷阵。这样的

干部，他不是走在“群马”之后挥舞鞭子的“牧马人”，而是飞奔在“群马”之前的奋勇当先之“马”；这样的干部，他不是高踞群众之上的官老爷，而是溶身于群众之中的普通一兵。这样的干部，他最能了解群众的要求和困难，最能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拥护。这样的干部也最能发动群众，做到“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圆满地完成工作任务。

上述两种状况，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违反了毛主席的指示。从形式上看，好像是完全不同的现象和做法，但从实质上看，却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是脱离群众的，违反毛主席的指示的，因而也都是错误的。

所以，我们搞工作，必须既要反对“单枪匹马”，更要做到“一马当先”。反对“单枪匹马”，就是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提倡“一马当先”，就是要带动群众，做到“万马奔腾”。

经一事，长一智。这一学期，我在切忌“单枪匹马”，争取“一马当先”方面，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做得比以前好了，能够较快、较好地完成宣传任务，真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用就灵。

^①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900页。

^②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0页。

^③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09页。



交通指挥，力争主动

长春市公安局交通三中队民警 刘 杰

做任何工作，都要力争主动，交通指挥也是一样。只要我们不断地进行调查 研究，努力熟悉和掌握各种车辆行驶的特性，不盲干，就能摆脱“堵车”的被动局面，使车辆畅行无阻。

过去，我在交通岗上指挥车辆，不能得心应手，经常出现“堵车”现象，有时弄得手忙脚乱，指挥错了，险些发生撞车事故。学习《实践论》时，看到毛主席说：“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①毛主席的这段话，给了我很大启发，使我认识到，交通指挥工作中所以出现“堵车”现象，主要是自己对于车辆行驶的特性还没有摸透，不能按客观规律进行指挥。以后，我就注意摸索各种车辆行驶的特性，以便根据各种各样不同的情况来指挥。

经过一个时期的实践，我发现轿车喇叭响得欢的时候，可能是任务急，遇到这种情况，就尽快放行。卡车嗡嗡响，速度慢的时候，必是载重量大，这种车，起车、刹车既

困难又费油，也要尽快放过。速度较慢，车箱很响，是没载货的空车，可以慢放缓行。有的车行车不稳，很急，一般说来这是司机精神不够集中，遇到这种情况，就要及时喊话宣传。同时，在指挥车辆时，还注意放第一个车迎第二个车，放车之前看前后，打起信号看左右，先放行车后放停车，及时排除交通障碍。这样，就大大减少了“堵车”现象，工作由被动变得主动了。

但是，主动和被动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指挥车辆的主动权不是绝对稳固的。在交通指挥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一些意外的情况。例如：在放行汽车时，可能出现骑自行车的人和汽车争道抢先，行人斜穿马路，儿童慌忙奔跑等。对于这些情况，如果注意不够，照顾不周，不仅会造成工作被动，而且还会发生事故。

过去，我总觉得这种现象很难避免，只好被动。后来经过一段了解，我认识到情况尽管复杂，归根到底，一方面是有些人忽视交通规则和马路上千变万化的情况，另一方面是我作为交警没有常备不懈、防备万一的精神准备。

解决的办法是，我利用业余时间，深入到一些单位讲解安全常识，进行安全教育。在岗位指挥时，思想集中，常备不懈，并勤宣传，勤纠正。这样，在交通指挥上就更主动了。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73页。



简单一些好，还是复杂一些好？

——从液压操纵箱的改革谈简单和复杂的辩证法

徐承德 顾舒

简单和复杂，是一对矛盾。在技术革新中，这一对矛盾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例如，一部机器，究竟是简单一些好，还是复杂一些好？机器的发展是愈来愈复杂，还是愈来愈简单？在改进机床设计的时候，怎样处理简单和复杂的关系？我们想，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研究这些问题，对开展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一定会有很大帮助。

上海机床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对液压操纵箱的改革，在处理简单和复杂这对矛盾方面，对我们很有启发。经过长期的努力，多次的改革，他们使液压操纵箱达到了比较先进的水平。在革新操纵箱的过程中，他们坚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和方法，解决了许多矛盾，其中也包括操纵箱结构上的简单和复杂的矛盾。

一般地说来，就机床而言，它的发展是由简单到复杂。这是因为，随着生产的发展，加工对象在性能上、尺寸上的要求越来越高。原始的简单的车床，一般是不能用来加工精密机器的零件的。但是，我们能不能由此就认为，在任何条件下，复杂一定要比简单好，愈复杂愈好呢？上海机床厂的职工革新操纵箱的过程，生动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液压操纵箱是磨床的心脏，它的性能怎样，对磨床能否加工出高精度的产品，关系极大。可是，原来上海机床厂用的磨床上的液压操纵箱，在没有革新以前，结构是相当复杂的。一台磨床上操纵箱有两个，一个是控制磨床工作台往复运动的，叫做操纵箱；一个是控制磨头（即砂轮）进给运动的，叫做进给箱。工人加工制造时劳动强度高，材料消耗也大，还不能保证产品质量。能不能把它改革得轻巧、灵便和简单一些呢？

工人认为，这虽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经过努力可以做到。他们认为操纵箱所以复杂，是因为它的零件太多。因此，他们主张先从控制磨床工作台往复运动的操纵箱的零件上开刀。这个箱一共有四个阀，即“开停阀”、“节流阀”、“换向阀”和“先导阀”。这四个阀看起来是“一个萝卜一个坑”，都有它的作用，动不得。可是，工人们从自己的生产实践经验出发，又研究了收音机上的一个开关。他们想，收音机上的开关，不是既能起开停的作用，又能调节音量吗？根据这个原理，操纵箱上的“开停阀”和“节流阀”能否也合并在一起呢？如果这样一改，“牵一发，



动全身”，不单是省掉了一个阀，并且还省掉了许多零件，整个箱体的结构也会改得轻巧些。

他们经过试验，“开停阀”和“节流阀”果然合并在一起了，操纵箱的结构比原来简单多了，体积缩小了，重量减轻了，生产效率也有了很大提高。这就告诉我们：本来看来动不得的复杂机床，经过人们的主观努力，是可以变得简单的；而且，操纵这种比原来简单得多的机床，却能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来。可见，那种认为机床愈复杂愈好的看法，显然是没有根据的。

“开停阀”和“节流阀”的合并成功，给工人们很大鼓舞。于是，他们就想：能不能把“换向阀”跟“先导阀”也合并在一起呢？如果把这两个阀也合并在一起，那末，原来的四个阀，就变成两个阀了。而且，他们在试验中又发现，把这两个阀合并在一起，还必须把这个合并的阀套在已合并的“开停节流阀”上去，这样，实际上就是把四个阀并成一个阀，操纵箱的结构更要简单得多。但是，经过试验，试制出来的操纵箱不能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四合一”的阀，本身的构造太复杂，许多管路的油都要流经这一个阀，造成压力不平衡，操纵起来非常笨重，根本不能用。这次改革没有成功。但他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就是说，简单一些好，还是复杂一些好，要看具体条件，要看是否能促进生产多快好省地发展。如果离开了具体分析，以为任何复杂的东西，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变成简单的东西，这同样是不正

确的。

把阀再合并看来已搞不下去了，工人们就动了合并两个箱子的念头，主张把操纵箱同进给箱合并在一起。经过反复研究，大家一致认为行得通，因为操纵箱和进给箱的确有很多零件、管路是可以合并的。这样，不单是省掉了一个进给箱，节省材料和工时，还可以提高操纵箱的性能。因为，原来分开的两个箱合并在一起，并不是机械地拼凑在一块，而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就如同两个化学元素化合以后，产生了一种新的物质和新的性能一样。这就是说，复杂变简单，决不只是砍掉一些零件，而是要在摸清复杂原因的基础上，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改变部分零件乃至整体的结构，提高它们的性能。当然，合并后的一个箱，在构造上要比原来每一个单独的箱复杂，因而工人操作时碰到了新的困难，他们就针对这个问题，再一次改革操纵箱的结构。就这样，经过多次的改革，操纵箱由原来的结构复杂、笨重，变得越来越轻巧灵便了。

这个操纵箱的安装布局由复杂变成简单的革新过程，明确地告诉我们：整个箱体的简单是由局部零件的复杂换来的。把两个阀合并成一个阀，把两个箱合并成一个箱，这一个阀或箱的构造当然也就要复杂些。但这个局部的“复杂”，决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复杂。这就是说，从局部看，是复杂了，但这复杂里面包含着整体的简单；从整体看，是大大简单了，这简单却是更高一级的简单，其中包含着局部的复杂。整体的简单是我们的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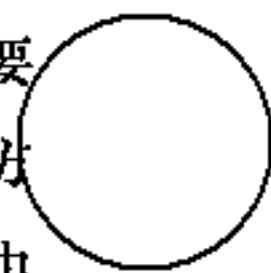
的，而局部的复杂是达到整体的简单的手段。如果人们不懂得正确处理整体和局部之间的简单和复杂的关系，以为什么都是越简单越好，要求整体和局部都要同时简单，操纵箱的结构革新就难以成功。因为把两个零件合并成一个，使这一个零件起原来两个零件的作用，在结构上就不能不复杂些。当然，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以后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这个合并后的零件，也不是没有简化一些的可能。

那么，同样是用局部的复杂换来整体的简单，为什么两个箱子的合并成功了，而“换向阀”和“先导阀”的合并却失败了？这里的关键在于：在一定的具体条件下，局部的复杂也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事物总是在一定

条件下向相反方面转化的。超过了这个一定限度，局部的复杂就不能带来整体的简单，相反地会使整体不能使用。

可见，在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运动中，正确认识和处理简单与复杂的关系，一定要破除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和绝对化。我们一方面不能把机床看得愈复杂愈好，不敢进行由复杂到简单的革新；另一方面，也不能以为愈简单愈好，不顾具体条件盲目开刀。只有对各种机床的具体条件进行全面分析，找出它们影响生产发展的复杂情况，对症下药，才能自觉地运用简单和复杂的辩证法，力争做到使机床结构小一点、轻一点、简一点、精一点，达到又巧又省的目的。

（原载《解放日报》1966年3月10日）



讀者
來信

坚决突出政治 反对折中主义

编辑同志：

我有一个情况，反映给你们，并希望组织力量在刊物上讨论。这个情况的概略是：

我在医院养病，一个兄弟厂的工人同志来看我，对我说他们厂党委正组织全厂职工辩论政治和生产技术的关系。我说厂党委有远见，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方法，符合毛泽东思想。他又说，他们车间也在开展

辩论。我问辩论的结果怎么样。他说：“结果使我很不服气。本来我们大多数工人，都认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生产技术工作是第二位的东西，应当服从政治。只有少数人同我们的意见相反。可是，我们的党支部书记（即政治指导员。以下括号里的话都是我加的）在总结时各打五十大板，说：‘你们都有片面性，都不是一分为二地看问题。（言



下之意，他会一分为二，请看他是个怎么分法。）政治和生产的关系，是辩证的关系。（说得多好听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就是强调辩证法吗！）政治要为生产服务，生产也要为政治服务，两者是辩证的统一，要相互服务，过分强调那一方面，都是片面的。（很可惜，这话一点也不新鲜，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早就批判过这个观点。）”

同这位工人同志谈话结束时，我冒昧地说，你们的观点是对的，符合毛泽东思想，你们那位支部书记同志的观点是地地道道的、不折不扣的折中主义观点，是机会主义思想，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你们应当用毛主席的思想同他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帮助他改正错误，改造他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让他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指导员。说完之后，我又把毛主席的有关语录和一些领导同志的文章，拿给他看。他看了毛主席的有关论述后，又高兴，又恼火。高兴的是自己明白了真理，恼火的是支部书记发表错误观点。他说回去后要 and 支部书记辩论。辩论得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反正我想这个问题是完全应当辩论的，而且大有辩头。

在突出政治上抱有折中主义观点的人，是不是就这一位支部书记呢？现实生活告诉我们，有这种观点的人不多，但远不止一个人。党内有，党外也有，工业战线上有，农业战线上也有，可以说到处都有，只是数量不同，程度不同罢了。他们的错误看法，也不止那位支部书记同志说的那些。诸如：“完成生产任务好，可以一俊遮百丑，可以带动

其他工作”，“生产和政治同等重要，应当在不同时期，轮流侧重”，“一手抓生产，一手抓政治，两者并重，不可偏废”，等等。事实证明，这些形形色色的折中主义观点，是突出政治的障碍，必须坚决反对。

有折中主义观点的人，总是打着唯物辩证法的旗帜，来贩卖折中主义的货色。他们一谈论政治工作同经济工作、技术工作以及其他一切业务工作的关系时，总是空洞的、抽象的“既要这样，又要那样”，“这一方面，那一方面”，“但是，而且”等等一大堆诡辩论。这一套东西，乍看上去，似乎像辩证法，好像有道理。其实，仔细一琢磨，是地地道道的模棱两可的折中主义。因为他们不叫人们知道那个是主要的，那个是次要的，那个是第一位的，那个是第二位的，那个是起主导作用的，那个是处于从属地位不起主导作用的。他们是把政治工作同经济工作、技术工作以及其他一切业务工作的关系，看成是半斤对八两，看成是等同的、均衡的。这就从根本上违反了唯物辩证法。

有折中主义观点的人，在突出政治这样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上，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手法。他们以唯物辩证法之名，行折中主义之实，打着突出政治的旗号，干着反对突出政治的事。他们总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口心不一，言行不一。他们这种做法，可以暂时或较长时间地蒙蔽一些觉悟不高、嗅觉不灵的人，可能给我们的事业造成很大的损失。

折中主义者用唯物辩证法来伪装自己，



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唯物辩证法在我们的时代有着崇高的威望，如果他们不披上唯物辩证法的外衣，就会找不到推销折中主义的市场。但是，我们必须坚决、彻底地揭露他们的真面目，不给他们留市场和地盘。只有这样，才能扫除突出政治的障碍，把无产阶级的政治空气搞得浓浓的，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举得高高的，以便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好地支援世界无产阶级革命。

目前，各级党的组织，各个部门，各行各业，都在学习、讨论突出政治的问题，都在开展一场要不要突出政治的辩论。辩论的中心是政治工作同经济工作、技术工作以及其他一切业务工作的关系问题。这个辩论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种思想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同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的斗争。这个辩论，是兴无灭资的大是大非问题。因此，不能低估这个辩论的现实意义、理论意义。

在这个辩论中，一些人的不要政治，忽视政治，排挤政治，贬低政治，“经济第一”，“技术决定一切”，“生产任务是重中之重，硬中之硬”等资产阶级观点，已经或正在遭到

严肃的批判。现在可以说，这些错误观点已经很少有市场了。就在这个关键时候，有的人拿出折中主义来为那些错误观点辩护，这肯定是徒劳的。既然有折中主义观点，我们就应当辩论一下。我希望各级党的刊物、报纸，都讨论这个问题。

这个辩论很好，而且好得很。它就像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讲堂一样，可以叫全国人民上一堂生动的毛泽东思想的课。经过这个辩论，必将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加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更有力地批判和粉碎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思想。从而，使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更新的变化，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促进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和超额完成。

坚决突出政治，反对折中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毛泽东思想万岁！

此致

革命的敬礼

哈尔滨市国营东安机械厂
政治部干事、共产党员 倪志荣

三月二日

启 事

本刊今年第一季度共出版四期，第一季度的订户，不另加费。第二季度的《红旗》，从第五期开始发给订户。

